

附录一：张浩同志著作选

- 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133 ）
- 职工问题（一九三八年四月）……………（ 137 ）
- 职工运动讲授提纲（一九三八年七月）……………（ 141 ）
- 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言
的一部分（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160 ）
- 持久抗战中职工运动的新任务……………（ 171 ）
- 我所过的“五一”（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176 ）
- 五四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183 ）
- 工人学校开学典礼开幕词（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 189 ）
- 汉阳钢铁厂罢工斗争的坚持与胜利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193 ）
- 纪念“二七”的意义（一九四〇年二月）……………（ 198 ）
- 对女工运动的一点意见（一九四〇年三月）……………（ 209 ）
- 工人与宪政的三个故事（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215 ）
- 站在抗战最前线的华北工人（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 219 ）
- 祝贺朱宝庭同志六十大寿的信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228 ）

附录二：张浩年谱

张浩年谱·····	熊经浴 李海文 (232)
编后记·····	(266)

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为什么要利用公开或半公开

在反动统治之下，人民还没有得着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的时候，或者从已经得到了许多的权力与充分的自由的环境中如苏维埃区域暂时转入游击区域的情况之下，党的组织是要绝对秘密的，党的群众活动与群众组织形式则要很灵活的尽量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即是在客观环境允许与可能的条件之下，聚集与锻炼自己的力量，准备于有利时的进攻。因为群众活动与群众组织形式若限于秘密的狭小的范围，则必不能包括广大群众，不能形成一个坚强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在于团结。全国邮务总工会，虽然在黄色领袖领导之下，他终究表现了他的力量，发动了空前的全国性的总罢工。^①群众的觉悟是随着组织的力量斗争的经验而提高的，特别是没有改良主义基础的中国，只要群众有了组织，最容易走上革命的道路。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四个月的时候，还只有工人士兵的少数拥护，到十月革命时，便已获得群众的大多数，这是一个最好的教训。特别是从苏区暂时变为游击区域敌人占领区域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善于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更要善于利

-
- 这是张浩同志为总结党的白区工作经验，纠正“左”倾错误，实现策略路线的转变而写的。原载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出版的《党的工作》第四期。

用一丝一毫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保存和锻炼自己的力量，预防和阻止动摇与叛变的现象发生，用群众的潜伏势力制止反动势力的猖獗，准备于可能时的反攻，否则将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溃败。另一方面，若不估计客观的环境的可能，而采用争取公开活动的方式，则必受到严重的打击，削弱自己的力量。立三时代^②所给我们的血的教训，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利用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即是说在当时当地统治阶级所允许的条件之下，尽量利用而不是争取。因此，利用公开的与半公开的问题，不论在任何反动统治之下都有必要与可能；至于争取公开存在，则只有在广大的群众已经起来坚决斗争，统治阶级动摇到不能继续统治或无力镇压，估计到某一区域有公开存在的可能，或革命已发展到夺取政权的时候，才有提出的可能与必要，否则将受到绝大的不利。

二、过去的经验教训

汉口人力车夫在“二七”失败以后，在吴佩孚、萧耀南极严厉的白色恐怖之下，为了纪念施洋同志和检阅自己的力量，乃利用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的盂兰大会^③，开了一个大的群众会议，不独施洋夫人与来宾利用招魂台发表演说，并且由施洋夫人捧着灵位领头作了一次壮烈的示威游行，军警对之毫无办法。天津利用黄色工会的联合组织，开展了工人群众的政治和经济斗争；陕北的同志过去利用哥老会的掩护进行秘密工作与游击运动，建立了抗日的根据地，都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不了解利用公开可能的重要，受了不少的损失。如上海的群众工会^④，原来都是在党的领导与影响之下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因为我们不能灵活的利用合法存在的可能，而把工会的组织与活动转到秘密状态之下，致使活动的范围大大的缩小，组织狭小到不能成为一个力量。四川自流井的盐工万余人，大多数都组织在行会的老君会里，黄色工会与赤色工会都不发展，我们的同志只怨群众封建落后，而不知道打进老君会里去工作，利用旧的组织形

式，进行新的群众革命工作，等等。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与研究的。

三、怎样去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

利用公开或半公开存在的可能的先决条件，即是依具体的客观政治环境，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力量、斗争情绪来决定。它是最灵活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多少可能，便利用多少可能以团结自己的力量，创造在敌人内部的堡垒，准备必要时的战斗。如在白色区域，某些区域的民众团体，如工会、农民会、学生会，甚至抗日救国会等等，能够合法公开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利用这一可能，取得合法的公开存在，扩大群众的组织，锻炼群众的战斗力，加强群众的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又如某些区域群众的组织与活动没有任何公开的可能，那么就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组织，如鲁班会、老君会、关帝会、同乡会等类似的组织，来组织群众；同时打进到青红帮、在理会、哥老会等秘密组织里去，利用他们的群众关系，去进行我们的工作，以取得半公开的可能。至于苏区的边区或由苏区转变为游击区如北面的地区，群众既不能阻止敌人编制保甲，则只有“应付他”自己编保甲，使得保甲中的实权拿在我们手里，在可能范围内，保护群众的利益，帮助群众的斗争（如要求粮食等等），并利用哥老会的关系与掩护，以进行半公开的活动。又如在××军进占的区域，如果抗日救国会可以公开存在，当然很好。假如有另一情况，政训处要登记指导才允许公开存在时，我们亦可“应付他”，利用他们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进行我们的抗日工作。若连这个可能也没有，他们硬要编保甲，则我们亦只有利用编保甲的方法，以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以准备将来有利条件之下的进攻。一个能干的共产党员不仅表示在顺利的条件之下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而且要在困难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利用各种可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是最能顺利地帮助工作进行的。关于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问题，

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在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和持久性的特点上，是很重要的，对于非苏区的工作尤为重要。我现在只提出这一个简略的意见，望同志们详细的讨论，以便利我们进行群众工作。

注

- ① 邮务工人全国性的总罢工，指一九二八年十月由上海邮务工人发起，得到南京、北平、天津等地邮务工人响应的一次大罢工。罢工的主要要求是改良待遇和改革薪金制度，结果取得了略加工资的部分胜利。
- ② 立三时代，指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 ③ 盂兰大会，即盂兰盆大会，是一种佛教仪式。其活动是，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晚上，请和尚念经，追荐祖先，并泼洒酒饭，以飧饿鬼。盂兰盆，梵语音译，意为“解倒悬”。

职工问题

(一九三八年四月)

在研究工会问题之前，应了解几个关于职工问题的基本问题。

(一) 谁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一般人以为地主资本家与大财阀是人类衣食的父母，他们不给吃，穷人便只有挨饿，他们不给穿，穷人便挨冻，以为穷人靠他们生活，所以认为他们是人类衣食的父母。

又有人说皇帝是人类衣食的父母，皇帝叫你活你才能活，叫你死，你便必须死，以为他是替天行道，代表老天爷的意旨的，所以说他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这个问题，直弄了几千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答，直到马克思时代，才有了正确的解答——工人农民是人类衣食父母。

这个理由非常的简单。因为大家全明白，地主、资本家、大财阀、皇帝等，他们离了工人农民给他们做工生产，是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也更没有多的钱供其享乐娶小老婆了。

相反的，工人农民离了地主、资本家、大财阀及皇帝，是不是还能生活穿衣吃饭呢？我们说离了他们，工人农民便会不受剥削压迫，得到解放自由了，不但有衣穿有饭吃而且过的生活更好了，如像边区与苏联一样。

-
- 此文原稿未注明时间，据老同志回忆，估计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张浩同志在安吴堡职工大队的讲课提纲。

由此可知，地主、资本家、大财阀与皇帝，他们全是不劳而获，靠剥削压迫工人农民而得到了金钱来享乐的，所以他们是寄生虫。工人农民供给人类一切需要，工人农民才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二）什么人最能干？最有力量？最靠得住呢？

社会上的人可以分为几种，我们一个个地来分析。

1. 地主、封建军阀——他们非常能干，最会压迫与剥削工人农民，也最会欺骗工人农民。他的能力是反革命的，是与工人农民广大群众的利益相反的。他们的力量也算不小，但是他们与群众的利益相违背，就一定会被群众打倒的，推翻的。

2. 资本家——他们有钱有势，能力极大，最会剥削工人。因为他们与地主军阀一样的违背群众利益，所以他们也一定会被推翻打倒的。尤其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先天的不足，他们最怕工人罢工，可是不论他们怕不怕，结果是一一定会被打倒的。

3. 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上没有经济基础，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倾向真理，为无产阶级奋斗，而走向革命的道路；另一部分专替资产阶级说话，成了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的工具。

4. 农民——他们固然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但是他们也是分化的。他们的欲望是由雇农变成贫农、中农甚至富农，但是事实总是相反的由富农变成中农、贫农、雇农，甚至成了完全的无产者，成了工人。所以农民有分散的、各顾各的利益的特点。

5. 工人——他们是无产阶级。大工业的环境锻炼了他们，他们过的是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他们的眼光远大，不是只为自己的利益努力奋斗。革命对他们毫无损失，而且可以得到自由解放，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损失只是脖子上的枷锁，所以他们革命最坚决、最彻底。世界上的工业无产阶级一天天只有增多，他们的力量也就会一天天的发展扩大，所以他们也是最靠得住的力量。

工人有了组织，便成了无坚不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工人联合

起来便成了“天”了。

(三) 工人要找什么人做朋友?

一个人生在世上要交朋友。俗语说：“光棍光棍，要人帮衬”。

一个阶级也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因为革命不是靠少数人可以得到胜利的。朋友少了敌人便增多了，朋友多了敌人便少了。到底工人应当找什么人做朋友呢？

1. 地主军阀是工人农民的对头，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是根本冲突的。间或与他们合作，也只是暂时的，要想作为长期的终身朋友是不可能的。

2. 资本家与工人是对头，与他的合作也只是某一时间而已，不可能交为终身朋友。

3. 知识分子，革命的、前进的我们当然欢迎，不革命的力求争取他们。

4. 农民与工人同样受军阀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他们的利害是一致的。工人离了农民来革命，便是失去了广大群众的同情与帮助；农民离了工人来革命，便失去了正确的方向，要得到本身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他们俩的关系好象刀刃与刀背的关系一样。工人是先锋，团结如钢好似刀刃；农民人多，是革命的强大后备军，好似刀背。

所以工人一定要找农民作朋友。

(四) 谁是农民的最好朋友?

农民由于本身的弱点，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得不到解放的。俗语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农民联合资本家地主进行革命，结果也总是受人欺骗而得不到解放。欧美各国的历史都证明此点，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也是一样，汉朝刘邦的起义就是一个好的例证。

农民只有以工人为朋友，共同努力，才能得到解放，像今天的苏联与边区一样。

（五）工农联合，谁领导谁？

这里讲的不是个人领导个人，而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说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他革命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他具有大公无私的意识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而农民则受到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具有保守的自私自利的意识。所以应当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无产阶级之先锋队（最优秀的部分）来领导，——以无产阶级的参谋部，共产党来领导。

职工运动讲授提纲*

(一九三八年七月)

第一讲 职工运动的一般问题

(一) 什么叫职工运动?

我们讲的职工运动，不是如封建主义者所谓的同情穷人的慈善运动；也不是如资产阶级所谓的单为改善生活的苦力运动，或拥护剥削压迫制度的贵族工人运动；而是参加现代工业生产、创造世界财富的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劳动者，为谋求工人阶级本身的经济、政治的权利及全人类解放的一种社会运动。这种职工运动是各种民众运动中的主要部分，参加和领导这个运动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基本工作。

(二) 现代职工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职工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工业革命后的必然结果。

工业革命前只能有行会运动，不能有现代的职工运动。

由于工业革命，机器把工人集中起来了（从一七八五年英国有第一部蒸汽的纺织机开始），手工业的工人也变成大工业的附属物。同时，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工人变成了工钱奴隶，受尽各种剥削与压迫。

-
- 这是张浩同志在延安为工人干部训练班编写的讲课提纲的一部分。他原计划在提纲基础上编写一部《职工运动教程》，但是提纲尚未写完，就因积劳成疾，未能如愿。

产业的继续发展，使资本家逐渐离开生产而腐朽化、寄生化，工人便逐渐成为创造世界与掌握世界命运的主人。

为了产业的进步，要求工人掌握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同时，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引起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知识分子的失业，使他们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快要决定胜负的时候，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人物，竟脱离旧关系投入革命阶级，他们都给无产阶级带来了知识和进步的新要素。使得工人阶级不仅具备了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而且获得了改造社会的精神武器。

工人阶级对人类的贡献很大，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对于自己力量的自觉不断提高，但是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受到的压迫也在不断加重，这样就很自然地产生了现代的职工运动。这决不是人力故意制造的。

（三）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作用

1.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参谋部。
2. 集合全世界的工运经验，领导与推动职工运动前进。
3. 用最大的牺牲精神，领导职工运动取得最大的胜利。

（四）职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和组织形式

1. 职工会的性质：职工会是由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产生，是由于各种不同职业的工人感觉到必须团结起来，把工人本身的竞争变成对资本家的斗争，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求得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职工会应保持自己的阶级纯洁性，不是工人，不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活来源的人，剥削人的人，不能加入工会。

2. 职工会的主要任务：

组织工人——把各种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一种伟大的力量；
教育工人——提高工人政治文化水平，造就有远见的觉悟分子，培养各种治国人才；

领导工人斗争——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和日常工作，保护工人利益，使工会成为工人的第二家庭。

3. 职工会的作用：

职工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作用。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种：

在平时，职工会是团结职工、保护职工利益的堡垒；

在革命斗争中，职工会是共产党领导职工夺取政权的桥梁；

在革命胜利后，职工会是组织职工“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以后逐渐地也管理农业）的学校”^①，是政权的支柱。

4. 职工会的组织形式

按组合原则分，有职业工会、产业工会、工会联合会或总工会。它们都有地方的和全国性的组织。

按性质分，有工人自己的工会、官办工会、老板工会、工人贵族工会、旧形式新内容的工会等。我们的任务是把后三种工会变成工人自己的工会。

此外，还有各种工人的辅助组织，即附属组织。如：合作组织—消费合作、生产合作等；文化娱乐组织—读书会、歌咏队等；体育组织—足球、篮球、拳术等；战时的辅助组织—战时服务团、洗衣队、慰劳队、破坏队等。

（五）开展职工运动的工作方法与方式

1. 具体地细心地了解客观情况—这是开始到某一新的地方，处理一个新的问题，或者旧的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时，必须特别注意的基本观点。因为，只有了解具体情况的特点，方能在整个工作方针下决定适当的工作方式与方法，才能对症下药。在了解客观情况时，应当注意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过去是否有过组织或斗争及其经过；（2）当地工人群众的民族的、阶级的觉悟程度；（3）工人的生活状况及其迫切要求；（4）工人中成份的差别、帮口、会党、民族、宗教、及特殊的生活习惯等情形；（5）群众中有信仰、较进步的可以作为工作依靠的分子；（6）资方营业状况、民族意识、管理方法；（7）当地党政机关和武装部队情形；（8）其它民众团体的组织及其工作。要从各方面搜集材料，加以正确的分析；并且要一面了解，一面细心地工作，在工作中更

深刻地了解客观情况。

2. 依据主要的中心问题，决定一般的工作。如讨论与要求实现抗战建国纲领，积极参加“献金”、“七七纪念”等整个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达到统一行动与统一组织的目的。

3. 依据各个产业和企业的不同情况，解决个别的具体问题。如铁路、兵工厂、邮务等国营企业，面粉厂、纺织厂等私营企业，印刷、汽车等分散的小工厂，以及店员、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和问题，在他们中开展工运工作的方式方法都应当有所不同。

4. 善于适时地求得公开合法地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机会，不要失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

5. 善于运用各种关系与各种形式去组织群众。如运用同乡会、行会、兄弟会、姊妹会等。

6. 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为此，要注意：（1）生活习惯和服装的群众化，最好与群众一起参加生产；（2）细心地、具体地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情绪；（3）用群众的语言说群众要说的话；（4）用群众的力量做群众要做的事，永远和群众联系得紧紧的。

7. 刻苦耐劳，不怕困难。刻苦耐劳是取得群众信任，完成任务的先决条件。困难是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我们要考察困难的来源，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当困难被克服的时候，必是最进步、最快乐的时候。

8. 保持工作的经常性与独立工作的精神。不因受挫折而垂头丧气，也不因一时的胜利而冲昏头脑；要利用突击的工作方式加强经常工作，不要因突击工作影响经常工作，形成工作上的寒热病。战时环境，时时都有被敌人隔断的可能，若没有独立工作精神，便不能继续工作。

9. 头脑要冷静，情感要热烈。只有热烈的革命感情，才能吸引群众、团结群众、动员群众。只有冷静地分析问题，才不致误事。

10. 倾听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只有倾听群众的意见，才

能了解群众，才能说出群众要说的话，做群众要做的事。只有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产生新的工作方针和方法，获得新的干部。

11. 说服与教育群众。当一个好的正确的意见未得到群众了解时，必须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注意避免脱离群众的现象。要根据各种事实去教育群众，使之从自己的经验上认识意见的正确而坚决执行。对群众不能有强迫命令的方法，只有当群众大多数被说服之后，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之下，才能使少数跟着一致行动。

12. 帮助群众解决他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争取群众最好的办法。

13. 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是得到群众信任的决定性条件。

第二讲 中国工人的一般状况

(一) 中国工人的数量及分布状况

中国工人的数目，现在还没有很清楚的统计，只能根据各方面的估计，明白大概的情形。

产业工人的数目，根据普通的估计，大约有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其中主要是交通工人，轻工业工人和矿业工人。

一九二七年苏兆征的统计，中国产业工人计有二百七十五万。

一九三三年实业部劳工司的统计，在二十三省、市中，共有产业工人二百万零二百五十六人。其中所知道的男工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九人，女工四十二万一千八百零五人，童工六万一千八百三十一人，性别不明的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九百六十一人。^②

根据另外一个统计，则中国产业工人数目与苏兆征统计的相似。即：

纱厂	二十八万	丝厂	十六万
矿山	五十四万	海员	十六万
铁路	十二万	码头	三十万
五金	五万	建筑	二十万

电汽	八万	邮电	九万
市政	二十五万	盐业	二十五万
烟草	四万	粮食	六万
印刷	五万	其它制造业	十二万 ^③

一九三六年实业部调查，重要工业中心的民族资本工业中，工人共有二十二万七千八百人，可见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民族资本受了很大的打击，又可见中国民族工业的衰弱。

苏联卡赞宁的估计，中国纺织工人约有三十万，丝织工人约有二十万，矿工约有二十五万，铁路工人则在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之间。

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记载：俄人托格雪夫根据各种矿工的效率及我国各矿之生产额，估计全国矿工二百二十八万九千人。^④

城市手工业工人，如果包括苦力工人、店员工人算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许多小城市里面，手工业、小商业还占着经济上重要的地位。

根根十年前北京农商部的统计，城市手工业工人约有一千二百万人。即：

纺织	三十二万	矿业	六十万
建筑	六十万	成衣	八十三万
茶业	三十五万	发网	八万
草帽	十五万	磁器	二十五万
鞭炮	二十万	理发	二十四万
五金	十六万	制革	三十万
造纸	十五万	苦力	一百二十万
食盐	四十二万	粮食	二十四万
店员及学徒	一百六十万	船夫	一百二十万
印刷	八万	其它	三百万
总计一千一百九十七万人。 ^⑤			

另据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上海出版的《光明之路》所载，中国手工业工人总数为一千二百一十六万人。

农村里的劳动者（即农业无产阶级），数目比上面说的产业工人和城市手工业工人更大。根据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土地委员会的估计，全国农村人口三万万三千六百万，没有土地的农民占一万万八千六百万，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中雇农大约有二千九百七十六万。^⑥这个估计，虽然还是十年以前的材料，但十年来因受日寇侵略及别的原因，农村经济一天天破产。这个数目只有增加，不会减少的。

根据上面的材料，大概可以明白：

产业工人——约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

城市手工业工人——约一千二百万。

农村劳动者——约二千七百万至三千万。

我们研究职工运动，主要的还是研究产业工人，因为产业工人是职工运动中最主要的力量。

中国工人的分布状况，除了城市手工业工人分布在内地各城市，农村劳动者分布在各地农村以外，产业工人都集中在几个中心的工业都会，主要的都会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无锡等处。铁路工人与矿山工人，也和这些都会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工会多半设在这些地方，如平汉路的总工会设在郑州、汉口等。

一九三〇年统计，上海、天津、汉口、无锡等地方的纱厂工人，共有二十万零三千三百四十四人，占全国纱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点三。

盐业工人大部分分布在沿海各省，以江苏为最多。在四川、青海、甘肃、宁夏等省也有一部分。

另据上海、无锡、汉口、广州、福州等地男女童工的统计，说明女工、童工的比重是很大的。如：

上海的工人总数是三十六万二千八百九十四人，

其中男工 五万四千九百五十五人

女工 一十八万八千一百八十八人

童工 一万六千一百一十一人

未分性别年龄的工人 十万三千六百四十人。

无锡的工人总数是七万零六百八十八人

其中男工 一万八千三百九十八人

女工 四万二千九百五十九人

童工 九千三百三十一人。

汉口的工人总数是一十六万九千八百九十二人

其中男工 一十一万二千三百九十四人

女工 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人

童工 二千六百三十人

未分性别年龄的工人 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八人，

广州的工人总数是二十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二人

其中男工 四百五十六人

女工 一千二百八十人

童工 七百人

未分性别年龄的工人 二十三万六千九百二十九人。

福州的工人总数是一万六千零三十二人

其中男工 五千零七十八人

女工 一万零六百五十四人

童工 三百人

从工人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女工和童工的使用，非常普遍，数目比男工与成年工人大，这是资本家为着便于剥削压迫；产业工人多半分布在沿海各工业中心区域，所以沿海各省被日寇占领后，中国民族工业与工人本身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轻工业工人，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数目比较大。所以他们在职工运动中，常常站在重要的地位。

（二） 中国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中国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首先要讲到工作时间问题。根据国民政府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公布的工厂法，成年工人以八小时工作为原则，最多不得超过十小时；童工不得超过八小时；女工、童工

不得做夜工。

但是，这些法令并未实行。实际上，中国工厂工人现在普遍都做十二点钟的工。在换日夜班的时候，工作有时延长到十六小时；只有在极少数的国营工厂里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如兵工厂、造币厂、水电厂等。

铁路工人，运输工人，邮电工人，也未完全实行八小时制。如同蒲路工人，在一九三七年时还彻夜做工，至于在军事行动紧迫的时候，工人是没有什么休息的。

手工业工人与店员工人，根本就没有规定工作时间，他们常常天一亮就上工，一直到深夜十二点。

在工作当中，一般的都没有休息。上海许多工厂工人，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吃中饭，只有少数工厂，在中饭时休息半小时（大约在中午十二点钟至半点钟）。

中国工人的工钱也是很少的。根据几个中心工业都会的调查，大概如下：

调查年份	地点	最高工资	最低工资	一个工人所需生活费
一九三三	上海	男工 二十四元 女工 十九元 童工 十元	八元 六元 二元	十九元
一九三四	天津	二十九元	三元四角	十五元
一九三三	汉口	男工 三十四元 女工 二十元 童工 九元	八元 四元五角 一元二角	十九元
一九三四	北平	二十元	九元（以织工为例）。	

上面的统计远不是完全的，而且这里面所列的最高工资，只有极少数熟练的技术工人才拿得到，一般的工人都只拿着最低工资。而且实际上包工头和领班还要从中剥削。发工资的职员，常常在工资尾数上打算盘，克扣工人的工资。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东西一天比一天贵，生活程度一天

比一天高，而工人的工资却一天比一天下降，这就使得工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痛苦。所以近年各地的罢工，普遍要求不减少工钱（增加工钱的还比较少些，可见工人在国难期间委曲求全，要资方谅解）或者改善生活待遇。

在手工业工人和农业无产者中，工钱比产业工人更少，生活也更苦。他们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大部分青年学徒或牧童，根本就没有工钱，而且连饭也不给吃饱。

在中国工业中，还有许多半封建式的奴隶剥削方式，特别是日本资本家开的工厂，这种方式用得更普遍，这些剥削方式是：

包身工制度。由工头到乡下去包定一批工人（主要的是女工），先给他们家里二、三十块钱，说明包三年或五年，这三年五年中，做工赚来的工钱，全归工头拿去，只由工头供给工人食宿，照例每天两顿稀饭，一套布衣服，生活非常痛苦。

包工制度。有些工厂里面的工作，可以拿到工人家庭里来做的事情，如打洋袜子，糊洋火盒子等，由一个工头承包，分给许多家庭妇女、儿童去做（这类剥削方式在日本国内也很普遍），工钱是非常少的，有的每天只能弄几分钱。

此外还有各种高利贷式的剥削。如卖工制度，工人先把整月的工钱以比较少的代价卖给工头。以便先拿点钱用，工头多半兼开包饭作、赌局等剥削工人。工头这些办法，都是经资本家允许的，因为资本家从这种剥削方式中也能得到利益，便于更残酷的榨取工人。

临时工制度或替工制度。因为近来失业工人过多，资本家就大批雇用临时工，工钱比固定的工人少得多，工作时间却比固定工人长；资本家又利用临时工来威吓固定的工人，加紧对固定工人的剥削。

有许多工厂（特别是国营工业）采取军事管理的办法，时常积欠工人的工钱，少则一个月，多则三四个月，有时打折扣，有时简直不发工钱。同时这种军事管理也是镇压工人反抗的办法，在这样的工厂中，工人是没有任何自由的。

工役制度。

改良形式下的封建剥削。

在手工业工人、店员、学徒之中，本身就是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的，这种剥削方式，在小城市里面更为普遍，为了保护这种剥削制度，店主、师傅们还定下了许多规条，这些规条使工人永远陷于奴隶的地位。

工厂中的工人，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取得法律上各方面的保护，有些法律上已经规定的保护工人的办法，也没有实行。比如：

工厂里的保险设备，一般是没的，每年惨死在机器下的工人，不计其数。

工人因工作而引起的伤病，大部分工厂的资本家是不管的。对残废的工人，也无抚恤的办法，许多工人常因伤病残疾失业，以至穷苦而死。有的工厂附有厂医，但大都马马虎虎，把工人性命当作儿戏，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准备。

工人失业以后是得不到救济的，而近年来因经济破产，失业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举北平的例子来说，一九二〇年，据甘米尔氏的调查，失业者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人；一九三〇年，据该市社会局的调查，失业者达二十三万人。这些失业人数不完全是工人，但也可以推测到工人中的失业情形一定也是很严重的。

工人的教育，除了少数工会自己办夜校以外，普遍都没有进行。

资本家对工人的日常待遇是十分苛刻的，除了上面讲过的情形以外，还有：（1）罚工钱的办法；（2）打骂工人；（3）取消花红赏工；（4）剥夺工人的各种自由，有时搜查工房，禁止工人外出等等。

工人的家庭生活，一般是十分痛苦的。独身的工人很多，因为他们还无法负担家庭的费用；工房多半建筑在工厂旁边，空气非常污浊，许多工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形成“日夜不空床”的现象；工人的娱乐生活是没有的，他们在十二小时的疲劳工作之后，全靠睡眠来恢复精力；工人的健康状况也是极坏的，特别是肺病、贫血以及因劳动过度的早衰现象十分普遍。

只有在过去的苏维埃区域与现在的陕甘宁边区里面，工人的生活才大大的改善了，但要详细说明他们的生活情形，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办到的，这一部分留给将来作专门的研究。

（三） 中国工人的组织状况

中国工人的组织，约可分为旧式组织与新式组织两大类。旧式组织，在工人中原有很大的势力，但现在已在逐渐变化到新组织，有的已在逐渐瓦解，只有手工业中这类组织还很普遍。这些旧式组织是：

各地方的手工业行会；

苦力运输工人中的地方帮口；

各种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如青红帮、哥老会等。

新式组织，即现在的工会。工会运动大约开始于“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前后，当时因工人参加五四运动，举行罢工（铁路、机器），逐渐形成阶级的工会。如唐山的京奉路职工同人会，长辛店的京汉路工人十人团等都是。武汉工团联合会、湖南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及一九二三年“二七”斗争中建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则是中国最早的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

新式工会大约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产业工会，包括一个产业部门里面各种不同工人所组成的工会，如同蒲铁路工会等，这种工会的斗争力量最大，组织也较严密，是最合理的工会组织。

第二种是职业工会，由许多职业相同的工人组成，如印刷业工会等。这种工会适合于城市手工业，适合中国许多地方的特殊情况，但人数较少，斗争力量不及产业工会。

第三种是劳动工会，包括各种不同职业不同产业的工人。如过去中国工人在法国组织的旅法华工工会，一九三五年上海的中国劳动协会等，这种工会，形式上虽极庞大，但因人数较多，组织散漫不严密，斗争力量亦不及产业工会。

全国性的统一的组织，一九二五年曾在广州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全国工人参加了革命斗争；但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

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至今尚未完全取得公开。

抗战爆发后，各地工会又纷纷成立。中国工人的组织状况，正在一天比一天发展。

（四）中国工人的特点

中国工人，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剥削，生活十分痛苦，所以很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并且革命性很坚决，很彻底，不容易接受改良主义的影响。

中国工人，因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开始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官僚（如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兴办的，那时民族工业资本家还是极其弱小的，而无产阶级却已经相当强大，在数量上占优势，一直到现在，中国无产阶级也比资产阶级强大。

中国工人，因为年纪还很轻，现在还不满八十年（约在光绪四年，中国封建官僚才开始兴办新式工业）。所以世代工人还不多，大部分工人都是从农村里来的破产的农民。所以中国工人和农民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革命中讲起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缘故，中国工人带着不少的农民性，有许多意识不健全的地方，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一些错误的一个根源。

中国工人，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历史条件，很快就参加了革命，并且在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所以革命斗争的经验很丰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中国工人，因为中国经济落后，经济破产的缘故，常常容易失业，所以有很大的流动性。这是中国工人一些流氓意识产生的根源。这种流氓意识，有破坏性，散漫、盲动、冒险，是中国工人中一个最大的弱点。

第三讲 中国过去的职工运动

（一）中国职工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职工运动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促进中国职工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主要是：

1. 在一八九五年中日签定《马关条约》后，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投资兴建铁路、矿山和纺织、面粉等工业。

2. 在外资刺激与世界大战影响下，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也得到相当的发展（如纺织、面粉等业）。

3. 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给中国工人阶级以光明的出路与最大的信心。

4. 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中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如上海的铜锡业、机器工人，印刷、火车、电车等工人均举行了罢工，特别是沪宁铁路工人的罢工影响最大。同时，从五四运动中锻炼出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使职工运动获得了组织与领导人材，如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等。

5.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它对于职工运动的领导。这是最基本、最有决定意义的。

（二）一九二七年前职工会的活动与组织

1. 一九二一年在上海由中共领导建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久便成为职工运动的发动机与核心。

2. 开过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只最后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秘密情况下开的。其中以一九二五年“五一”召开的第二次劳动大会为最有意义。当时到会有一百二十八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及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通过了许多重要的决议，特别是指出了工人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应该成为国民革命的指导力量与运动的枢纽，同时正式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3. 各省市普遍成立了各种性质的工会，如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广东工人代表会议、上海总工会、湖南全省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等。

4. 会员总数最多时到三百〇六万五千人。

（三）英勇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

1. 香港海员反帝大罢工。一九二二年一月由苏兆征等领导

的，参加的轮船有一百六十六只，罢工工人在三万以上。

英国当局用尽收买工贼、禁止罢工工人离港、枪杀工人等办法，企图破坏罢工，均无效。罢工坚持五十六天之久。结果工资增加百分之十五至三十，工会亦得恢复公开存在。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的光荣胜利，它揭开了“二七”以前工运高潮的序幕。

2. “二七”铁路工人反军阀的斗争与流血惨案。

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为反对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禁止工人成立工会，举行争自由、争人权的大罢工，遭到军阀镇压，因而发生“二七”流血惨案。

参加斗争的除京汉铁路全体工人外，道清、正太、津浦南段、粤汉等铁路工人，一致同盟罢工援助。惨案后，还有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领导的各业工人反军阀惨杀的总同盟罢工。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及法律顾问施洋的被惨杀，是共产党员为民族为阶级流的第一次血。

惨案的血帐：前后被杀工人三十九名，^⑧受伤的三百名，入狱的二十七名，因之失业的达五百名，各地工会均遭捣毁、封闭，连同情工人的《真报》亦遭封闭。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在全国民众的前面打出了争自由反封建军阀的旗帜。它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极重大的意义。

3. “五卅”反帝大罢工

“五卅”前，上海、青岛等地反帝罢工的高涨与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对中国工人的屠杀。

“五卅”惨案的经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工人为反对屠杀顾正红、反对逮捕学生、反对工部局提案，上街请愿宣传，被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捕去学生达数百人。为此群情奋激，自动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将近万人，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帝国主义巡捕向密集的群众开枪，死十三人，重伤十五人，被捕五十三人。继续屠杀至“六三”。

中国民众用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屠杀，甚至教会学校的学生和捕房均罢课罢岗。

工商学联合会于六月七日向租界当局提出十七项条件。但大资本家始终站在联合战线之外。

最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军阀的镇压、资产阶级的动摇，“五卅”运动在上海本地遭受暂时的挫折。

但是，惨案激起的反帝巨流，遍及全国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

“五卅”推动了全国大革命的浪潮，工人阶级在事实上，成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骨干和核心。

4. 省港大罢工

省港罢工是援助上海“五卅”惨案而举行的。六月二十三日广州、香港的罢工工人举行游行示威，遭到英军的袭击。因而发生死伤数百人的沙基惨案。罢工后在香港的工人，一律返回广州。留广州的英国人因仆役、车夫的罢工，亦不得不离开广州。罢工坚持十个月，英帝损失达五万万万元以上。罢工工人组织了武装纠察队和革命人民法庭以镇压汉奸走狗。

5. 武汉、九江工人领导民众自动的推动政府收回租界（一九二七年一月）。

6. 上海工人再接再厉地举行三次起义，驱逐了北洋军阀孙传芳，夺回了上海。

（四）大革命失败后（即国共分家以后）的职工运动

1. 一个痛心的数目字：

大革命前后会员数目的统计

年度	工会会员数目	调查年月及调查者
1923	230,000	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统计
1925	540,000	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统计
1926	1,264,000	1926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统计
1927	3,065,000	太平洋劳动大会中国代表报告
1928	1,773,998	当年十二月工商部调查

1930	576,250	当年四月，同上
1931	364,012	当年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报告
1932	410,067	实业部统计
1934	88,864	同上

2. 会员数目一落千丈的原因：（1）“四·一二”以后的残酷摧残——工会大部分被解散、改组或赶入秘密状态；工会的优秀领袖遭捕杀的达一万人以上，坐牢、逃亡、失业更不可数计。（2）国民党当局用各种办法分裂工会——在一个地方组织同样几个工会，如上海工会统一委员会、上海工人总会、上海总工会等，使之相互对立；腐化工会领袖，使之脱离群众；鼓励并保护不加入工会的人。（3）当局对工运加以重重的限制——不准有省市及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不准有产业性的工会组织，如英美烟草公司，三个厂均在沪，但不准建立总的工会；不准职员和手工业工人加入工会（民国十八年工会法）

3. 过去职工运动的主要教训：

（1）一般的只注意罢工斗争，而忽略了经常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

（2）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尾巴政策使工人阶级既不能尽量发挥应有的作用，又不能保持已获得的胜利。

（3）大革命失败后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使工人阶级当退守不退守，致将已有的力量消耗殆尽，不能聚集力量待机而动。

（五）中国职工运动的特点

从过去历史上研究中国的职工运动，我们可以看见，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经济等等条件，中国职工运动有许多特点。

第一、中国职工运动一开始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很快的从经济斗争的阶段进入到政治斗争，在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也正因为这个原故，同时也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缺少工人贵族，所以中国职工运动很少改良主义的影响，而是以最革命的姿态出现。

第二、中国职工运动，带着非常浓厚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自

然工人阶级并未放弃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但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上，几次伟大的事变，如“二七”事变、“五卅”运动、上海暴动，都是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为斗争对象的。这就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在这个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第三、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中国的职工运动与农民运动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以及大革命以后，工农团结更加密切。这说明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寻找同盟者，而主要的同盟者就是被剥削的数量最大的农民。中国的工人阶级是这样做了，如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各地的工农运动，一九二七年以后各地的工人农民革命运动，都表现了这一点。在半殖民地国家里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里面，这一点更加重要。所谓革命领导权问题，主要的就是领导农民，那一个阶级能够得到农民的拥护，那一个阶级就可以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第四、中国职工运动在国际上，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起来的。这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锻炼成了伟大的政治力量，在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所以中国职工运动能够学习国际上的经验，并得到国际上的帮助。这是中国职工运动一个外部的有利条件。

第五，中国职工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有光荣的传统。逐渐克服了本身许多弱点，战胜了职工运动中右倾的特别是“左”倾的盲动与破坏倾向。这对于今后的职工运动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注：

①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百六十页。

② 实业部编：《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十五页，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初

版。

- ③、⑤、⑦ 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第一百四十二页、第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三页及第一百九十八页，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上海青年协会发行。
- ④ 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一日出版，上册，第四——五页。
- ⑥ 天津《大公报》，民国十六年五月九日。
- ⑧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二七”惨案中当场遇难和受伤后死亡的工人为四十九人。另有三人因参加这次罢工，后在洛阳、郑州被捕牺牲，解放后追认为“二七”烈士。故“二七”死难烈士实为五十二人。

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在六届六中
全会上发言的一部分

持久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

在不同的地区执行不同的任务：

(一) 在长期抗战，在长期合作的原则下，工人阶级的岗位，是在抗战建国的前哨，它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即：

A、加紧敌占领的点线工作，克服困难，建立灵活的而巩固的堡垒与据点。

B、加紧敌后方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抗战的热忱；尽量武装工人，特别是矿工，使之成为全国工人阶级抗日的统一行动的与统一组织的模范与吸引力，使之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与基础。

C、在我大后方，应用一切方法帮助国防工业的发展，使之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并达到政府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

(二) 加强已有的工人组织，大量地组织无组织的工人，是目前职运最迫切的任务。应依据各种不同区域的经济、政治、军事不同情况和特点，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组织工人。拥护现有的合法工会，竭诚与之合作，使之变为群众的组织，尽可能地发扬民主生活。若能把散漫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就是职运的一个大进步。虽然工人最初团结和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工资，但到了相当的时候，“维持

组织之对于工人，就比维持工资还更重要”^①。因为工资待遇的胜利，不过是一时的事，“那真正的效果，并不在眼前的利益，是在劳动者的团结的继续扩大”（马克思）^②。因此决定斗争，须有两个条件：

A、斗争有胜利的可能，

B、工人群众的组织的扩大与巩固。

这是十几年来，我们在职运中痛苦的也可说是血的教训。

（三）加强民族革命主义的教育，提高政治文化水平。说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内在联系，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是相符合的，目前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就中国范围说，阶级的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就世界范围说，民族利益又要服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盟是长期的，所以国共合作也就是长期的，在中国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即是最忠实的国际主义者，只有民族的彻底解放，才能获得阶级的解放，要以这些观点，教育与说服工人群众，以提高其自觉性、纪律性与组织性，更加强其彻底性、坚强性与胜利的信心。

（四）国防工业的发展，是在持久抗战中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们工人要用一切的方法，帮助政府及厂方提高生产，反对浪费，保护产业，以表示工人拥护政府的热忱。诚心诚意的与政府合作，同时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启发工人群众爱国热忱的必要条件。

（五）发展与统一工人运动，是与抗战建国有利的事业，每个爱国男儿都应促其实现，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同志，更应负有这一责任。大家应爱护与集结这一民族力量，分散与抵消这一个力量，都是对民族的罪过。因此在每一工厂、矿山，每一地区、每一抗日根据地，均只组织一个统一的群众的工会。在全国范围内，现因日寇的野蛮占领，把中国在形式上分成若干不同的区域，现只有依据各种不同的区域和政治环境，进行艰苦的、耐心的组织工作，从实质上

向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从抗战胜利的过程中，获得工人运动在形式上与实质上的统一。

（六）训练工人干部，从民族革命运动中，培养新的积极分子及领导者，使之参加各方面的实际活动，这是使我们的工作向各方面正确发展与巩固的保障，是我们与工人阶级密切联系的枢纽，是目前工作最中心的一环。列宁对造就与使用工人干部，曾有以下意见。

“我们最首要最迫切的任务是帮助造就工人革命家——在党的活动方面，其水平线与知识分子革命家相同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着重党的活动方面这几个字，是因为在别的方面要工人达到同样的水平线，虽然也很必要，但是远不是这样容易，这样迫切）”^③。

（七）肃清托洛茨基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与活动，这比其他部门与其他阶层中更属重要。因工人阶级中所遗留的狭隘观念、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现社会制度所给予的黑暗，文化程度的低落，生活的极端痛苦，十年来所积累的仇恨与工人的群众组织与党的组织之薄弱等等，在均有可能给托洛茨基分子以利用。自然，中国工人阶级有十七年来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的传统，有了自己的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武装与旗帜，有了国际的无产阶级特别是苏联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英勇事业与光明前途的影响，尤其是自己斗争的经验等等优点，是可以完全克服那些弱点的，问题只在我们加强这一工作。

（八）联合世界各国职工团体，共同抗日。把日寇野蛮进攻中国后，中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危害及其英勇斗争抗战胜利的信心与毅力，向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劳苦兄弟姐妹们宣告；要求他们不起装日本输出或输入的军用品、原料及其它货物，不替供给日本军火的资本家做工，抵制日货等等，同时用各种办法帮助中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同时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中国的海员工人应多负责并有计划地执行这一任务。

在各种不同区域的工作方针与组织任务

（甲）敌人占领的点线中的职运工作

（一）我们的基本方针是退却的，保存力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

估计主要的中心城市与工业区域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可以收复的，同时敌人要用一切方法消灭其占领区域的反日力量，以便巩固和开展敌之已得的胜利。因此，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已经暴露的力量分散，到近郊的乡村去组织农民，发动游击战争；可以隐藏的力量，立即隐藏起来。在主要的产业中如军事工业、市政交通，特别是军事战略区域内，建立不大的坚固堡垒，埋头苦干，没有胜利把握时绝对不轻易发动斗争，更不受敌人的任何挑拨，以期保存实力，不受摧残，准备我之战略反攻时，有真实的群众基础与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准备反攻的必要退却。

（二）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组织工人，把总的任务分开执行。这些组织须：（A）适合群众的嗜好、喜爱和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如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等）；（B）不引起人注意的，或者是公认为合乎道德的好事；（C）同时还要使敌人不感觉这些组织是对它的，甚至在外表上是对它同情或屈服的，因此，这些辅助组织必须尽可能的少具组织形式与尽可能的少带秘密性；如江北戏、京戏、黄陂戏、国术、玩石蛋、日文学校、英文学校、补习学校、小学校、阅报室、阅读书报小组、合作社、施医处、同乡会、关帝会、各种行会、佛教会、及其他流行的秘密结社……等。这些组织形式，它们只应起辅助的作用，是目前组织工人最好形式，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但要严守各个特点的机能，如学校只管教育，国术只管体育，不得超过客观可能的范围，使它们发挥各种各样的机能，并尽量使之发展，不要在形式上把它们联系起来。各个组织不要发生直接的关系，同时要严防与党的组织或工会中坚领导机关有任何混淆在一块儿的情况。这是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历久不疲的耐性，民族胜利的信心，民族志士的性格，才能做到的。

(三)对日寇组织的工会(如沪西的总工会)或其他民众团体(平津的新民会、上海的东亚同盟会、新亚会)。我们一方面,在口头或文字上经常不断地揭露汉奸日寇的阴谋,把他们真正的用意解释给工人听,并要向工人放出警号不要陷入他们的圈套,更不要使奸细混进我们的秘密组织里来;另一方面,工人运动的合法化,工人之有组织,特别是对中国有反帝斗争传统的工人阶级是有利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合法与公开的可能,进行一般的教育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们的发展将必然会给我们更多的宣传鼓动的材料,并且能加速某些合法的团体的出现。其结果不是日寇汉奸拉拢群众,搜捕共产党员、爱国志士,而是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找着更多的同志。

(四)同国民党的同志及工会领袖共同进行保护原有的工会组织,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原有工会在租界掩护下的,应尽量避免暴露,多作内部的组织教育及日常的互相救助的工作,如婚嫁病死等,颜色要弄得灰得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与中外的厂方在保护产业,维持生活的条件下,亲密合作以获得厂方某种程度的掩护,至少是使之保持善意的中立。工会的指导机关要选择各党各派或无党派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最坚强、最可靠,认识最清楚、最有经验、最有锻炼的工人领袖。组成小而精的团结坚固的统一战线的中坚领导机关。在与党发生联系时,要严守秘密规则,它的本身,亦要严守秘密的规则,严防敌人的袭击与暗害。若工会不在租界,则设法使这些群众的组织,不具任何固定的纲领章程会期,只有几条灰色的徵收会员的条例,成为特别广泛而自由的组织。如客观形势,使我们连这样组织也不能存在或者需要很大的代价时,则干脆公开宣布取消,以便保存实力另作他图。在这里,应该指出:这种情况迟早一定要到来,与其要付出不必要的代价,不如尽早公开宣布取消,另作计较的为妙。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宽广,工作环境更困难,运用的方式要更灵活。如:

A、救济难民须取得与中外慈善团体的合作。

B、在中国人保护中国人的口号下，组成除民族叛徒以外的不拘形式的民族统一战线，取得社会的掩护。

C、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垄断市场、强夺原料的默契下，与英美法等国的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

D、在保护中国的产业的口号下，结成每个工厂内的劳资统一战线。

E、在工人不分家、凡是拿工钱的人联合起来，保卫生活的口号下，结成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如有外国工人的地方，则与之进行反战反法西斯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统一战线。

F、一切在租借地或外人居留的地方，则与同情中国抗战的朋友结成反法西斯侵略阵线。

G、一切的统一战线工作，均要在各种灰色的名义之下进行，如慈善事业、人道主义、教育、卫生及同乡行会的联络等等，以遮掩日寇汉奸及其走狗托洛茨基分子的耳目。

(六)形式上的纪念会一律避免，因为这只是暴露自己的目标，是对敌人有利的；如果有某种必要须检查力量时，则必须采取不露目标的方式行之。

(七)严守退守时间罢工斗争的条件，即第一，要有胜利的把握；第二，使组织发展，特别重要的是要使组织巩固加强而不暴露。否则虽群众愤激，也要耐心地说服工人，不举行罢工斗争。

(八)形式上的统一组织与统一行动，在敌人的统治下，无论是租借地或有外人的地方，均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不应该的。

(九)在租借地及有外人资本的地方与纯粹敌人统治的占领区，在实行的程度上，应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方式，特别是要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同志，亲密合作采取一致的方针，或者是分工互助。

(乙)敌后方抗日根据地的职运工作

(一)基本的工作方向：

过渡时期，职运工作正是在敌人后方便于发展的时期，要尽量争取时间，把当地职工的大多数以至全部组织起来，形成抗日群众

力量的骨干，建立统一的行动与统一的组织，大量发动工人参加武装抗战的工作，与农民结成抗日保家的生死同盟，参加或配合正规军，为保卫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人占领区，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而斗争，以便锻炼与壮大自己，表现工人阶级战胜困难的英勇精神。在工人的与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在党、政、军中，在各种群众团体中，工人的骨干及其先锋队，就要显示出我们与日寇苦斗中的坚苦卓绝的精神，要用我们的勇敢性、坚决性、彻底性及对阶级及民族的忠诚，驱逐日寇出中国，争取最后的胜利。

（二）主要的对象：

A、产业或手工业的矿工，在敌人后方或战区的约二百万人，这是反对敌人的最好力量。他们在不能忍受的压迫下形成的反抗情绪，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决勇敢的特性，将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起伟大的作用，并且已经初步的显示了他们的作用。如：唐山矿工的起义，井陘矿工的神出鬼没，阳泉六河沟等工人游击队。

B、各铁路附近的道棚工人（即修道工人）是破坏铁路、阻扰敌人交通最好的武器。他们多数是本地人或已在该地成家，若能在每条铁路组织一个或几个铁道队，专司组织铁路工人破坏铁路，这对相持与反攻阶段，均有极大的意义。晋察冀边区京汉路工人铁道队已起了极伟大的作用。

C、手工业与农业工人，这占在业工人的最大多数，是持久抗战中乡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也就是十年内战中所积蓄的经验，可在全国运用。少奇同志著的“工会工作大纲”与边区总工会的手工业工会与农业工会的两个章程，在这里是特别值得郑重介绍的，因为这三个文件均是十年来工作经验的结晶，是根据持久抗战的环境融合起来的，是值得全国各地依据实际的具体情况，来利用的。

D、失业工人，城市失业工人，回到乡村的甚多，这是乡村群众工作干部的最好的来源，也是工人阶级有组织地推动和领导农民参加抗战及巩固工农联合的最好的条件，各地的党及工会应尽量搜集这些失业工人，加以适当的训练，使他们参加抗战动员工作。

E、协助点线的职工运动。点线职运是党的基本群众的所在，是最艰难而又重要的工作，它可以帮助了解敌情，协同动作。应经过秘密路线，与之建立密切关系，并经常给以人力财力的援助，精神上的鼓励与安慰。

(三) 中心工作：

A、广泛地动员工人参加抗战工作，积极武装工人，特别是矿工。工人游击队及其生长的正规军，必须戴上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帽子，但为兴奋和吸引全国工人参战的热忱与取得国际工人阶级的同情，必须保存其原名，如八路军井陘工人游击队，八路军唐山矿工游击队等；同时要大量吸收农民参加，有计划的训练挑选出来的工人干部，以便领导与充实其他队伍。

B、普遍地恢复与建立工会的组织，吸收全体无组织的工人加入工会，发展工会的民主作风，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工会内要包括各党各派各帮口职员，及不剥削工人的工头等等。

C、帮助政府及军队建立修理工厂及战时经济建设，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在可能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D、加紧民族革命主义的教育，开办工人干部训练班、工人夜校、识字班，提高战区工人的政治认识和文化水平。

E、安插失业工人，恢复生产，改善工人的战时生活。

F、关于劳资争议，工会应采取适当的方法，使之合理的解决，俾能集中力量，共同抗日。

G、实现工农的密切联合，多举行联席会议，以便在一切问题上协同动作。

H、积极援助被占领区的职工运动，在军事上尽量协同动作，以破坏敌人“以华制华”的毒计（政治经济方面的）。

I、动员全战区工人积极参加政府及抗日军队的一切工作，并选择积极的工人干部，送交政府及抗日军队分配工作，以便上下一致，协同动作，击退日寇。

J、经常与全国工会建立联系，可能时应派遣代表团到战场慰

问，互相交换工作经验，促成全国工人阶级行动的统一与组织上的统一。

（丙）我大后方的职运工作

（一）基本的工作方向：

A、在过渡的困难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表现出对民族无限的忠忱热爱，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露锋芒。并且用各种方法帮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在国家企业里尽量与厂方合作，提高生产反对浪费，用黄帝优秀儿女的至诚，感动当局，使其无丝毫顾虑的大步前进。

B、在三民主义的原则下，在国家法律的范围与当局的谅解及公开合法的条件之下进行工会工作，首先就是帮助已有的合法工会的工作。尽量吸收无组织的工人加入合法的工会；在保卫阶级的民族的利益的大前提下，竭诚的与工会领袖合作；为了吸引群众对工会、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烈爱护，必须多征求群众的意见，多采纳群众的意见，多吸收积极而进步的工作者参加工作；发动工人群众的最高的劳动热忱与杀敌勇气，为抗战建国、为加速反攻的准备而牺牲奋斗，使当局从需要群众进而爱护群众，更进而依靠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中华民国的国民作用，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蒋委员长所指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C、从抗战胜利的过程中获得全国范围内工人运动的统一，以便顺利的进行建设计划，建立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

（二）运用公开合法的可能限度去进行职运工作：

这即是说，不能根据主观的要求，而是根据客观上的规律去进行，只能逐渐发展，而不能突出，致妨大局。

（三）与了解我们真实用意的国民党同志去进行职运工作，以减少阻碍，而利于抗日救国的事业。

（四）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组织工人，以适合群众心理与客观可能为原则。

（五）陕甘宁边区的工人阶级，特别是边区总工会，是继承着十七年来英勇斗争的传统的。他们不仅有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全国

总工会城市职工运动的经验，而且有十年来乡村职工运动的经验，是与全国的工人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现在边区工人已获得了他们所要获得的一切。目前的问题在于边区工人阶级的觉悟的程度赶不上政治上发展的速度。因此，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边区工人的教育，以克服残留下的行会的狭隘性和保守主义倾向；尽量地培养与提拔本地的工人干部；眼睛要看到全国去，要相当的满足全国工人的希望。

工作方法方式的民族化、中国化、通俗化

（甲）应依据中国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的环境，与不同的风俗、语言、习惯，及一般的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许多特点，来决定工作的方法与方式。因此，不独不应机械地利用国际经验如斯大哈诺夫运动等，而且也不能机械地利用中国各地的工作经验（如在国家企业内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则提高生产反对浪费的口号是对的，若机械地运用到敌人占领区去，则完全是错的。在占领区里，“保卫产业”“保卫生活”的口号在中国厂里是对的，在日本厂里则又完全错了等）。我们要很客观的、很具体的了解与分析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及特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个的工作方针下，决定适当的工作方法与方式，才能对症下药。工作方法方式的是否正确，不在是否合乎某种公式，而在是否能动员群众，把群众引上逐渐进步的道路，走上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道路。

（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职运工作，处处要以民族为前提，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阻碍与隔膜，是于持久抗战争取民族生存的事业是有利的。例如：开办战时训练班，请厂长当主任，组织抗日救国会，请资本家当名誉主席，成立工会，请律师当法律顾问等等。

（丙）中国有五千年来的历史，在民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信条与习俗，若不善于运用与解释，则工作必不能深入与持久。例如俗语说，“工字不出头”，即上出头成“土”字，意为做工做到老死入土；或者因失业而下出头成为“干”字，那就更加痛苦。你只有

将计的向他解释为：工人分开，确是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若是工人联合起来，便有天大的力量。不信，请看工字与人字合起来不就是一个“天”字么？自来水工人罢工全市的人没有水喝；电灯工人罢工，全市立即成为黑暗世界；交通工人罢工，立即断绝交通，像人的血管停止一样；香港挑粪工人罢工，使香港立即变为“臭”港。若是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成功了，发动一个全国或全世界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及反法西斯的起义，则法西斯恶鬼只有死路一条，这不是比天的力量还大么？只有经过这样的解释，才能使工人记住：工人联合便成“天”，工人分开便不能出头，结论是工人不分家。

（丁）通俗的解释问题，是教育与提高群众政治水平与推动群众行动的必要条件。中国工人文化程度低落，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工人不认识字，“工人”这两个字，时常被叫作“天”字，不认识“天”字这也是常见的事情。团结、统一、联合、组织这些名词，在某一部分人听来，便立即了解，还有某一部分人听来仍是莫明其“土地堂”。又如“团结便是力”，这是很使一般群众费解的：他们总以为刀剑枪炮才有力，“弹绝”（团结）有什么力呢？老百姓总是没有力量的。自然这也是历史上留下来的残酷的教训，可是我们又非要使他们了解不可，这就只有借助于通俗的解释。如首先应承认一个工人一个农民是没力量的，如果人多了集合在一块儿便有力量；譬如一个工人或农民像一根火柴，一折就断，如果十根、二十根、一百根、一千根火柴捆在一起，就是用刀砍也不容易断；如果遇着一个蛮横的人硬要折要砍时，他就会折出火来烧他自己的手，砍出火来烧他自己的房子；再把罢工吃大户的实际例子告诉他，他便能了解“人多成王”，“狗多成墙”这些俗语的意思；如果有了很多的人，又有刀剑枪炮，那便所向无敌了。

注：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9页。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

③见《列宁选集》第五卷第441页。

持久抗战中职工运动的新任务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已进行二十二个月了。在这一伟大的过程中，足够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能用武力征服的，因为他不仅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天然条件，全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的志愿，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抗战过程中锻炼与生长的武装力量；并且有先进的政党，先进的军队，先进的阶级及许许多多愿为民族解放而牺牲一切的民族英雄、爱国人士做骨干，更有国际无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及爱好和平和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的人士的支持，伟大的“五一”劳动节，正是象征这一团结，这一光明灿烂的前途。

自抗战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在日寇野蛮进攻中所受的灾难，比任何阶级与阶层为严重！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对抗战建国的热忱；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彻底抗战，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信心，亦比任何阶级与阶层为坚决。英勇参战的如唐山七千矿工的武装起义，上海第二工人纵队在淞沪的英勇参战，并陘煤矿工人的奇谋杀敌，平汉路南、北两段的工友均组织了铁道破坏队，屡次破坏敌人，六河沟煤矿工人所组成的游击第四支队，磁县机器工人所组成的第三支队，阳泉矿工、正太铁路工人、晋华纱厂工人三个游击队所合组成的榆太游击支队，同浦铁工自卫队、太原工人自卫队、决死第四纵队等等，已在不断的抗日战争过程中，锻炼与成长为正规的抗日军。至于参加到各个战线与各个正式部队，与日寇肉搏的更占很大

的一个数量。另外还有很多工人忍受饥寒退出日本工厂，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日夜维护交通运输，积极生产，保障军队与居民的供给，购买公债募捐慰劳，协助农民的组织与武装等等。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即提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主张，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以后即不断地为抗战建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抗战发生后，八路军新四军立即开上前线，建立无数战绩，在华北华中建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支持了全国抗战胜利的信心等等。这些均足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独过去大革命时代是站在民族解放的先锋地位，就是现在伟大的抗战时代，同样的是站在民族解放的先锋地位。它是反对日本强盗最觉悟的最坚决的最彻底的中坚支柱。

由于日寇的进攻，占领主要的中心城市与产业区域，致使我们工人的队伍遭受了很大的摧残，同时又把中国的版图，分裂成为几块，亦阻碍职运的统一与进展。由于许多地方对于工人组织之歧视，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中所给予的民主自由，尚未能顺利的实现，当局内部的派别冲突，也就阻碍职运的统一与进展。更由于许多资本家工厂主只顾私利，不明大义，时常以裁员减薪，关厂失业相威吓，工厂迁移内地不带老工人，这不仅使大多数工人失业，而且工厂开工也不易找着工人，致双方均受其害。特别是反对工人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这不仅剥夺了工人应享的国民一份子的救国权利，尤其是浪费与消耗了争取抗战胜利的生动的主要的力量。同时还由于工人内部统一运动的努力不够，由于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工作还没有达到必须的程度，所以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组织工人阶级并发挥其力量到最高度，是争取抗战胜利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因此，我们今后职运的任务与方针，应当是：

一、继续动员工人积极参加抗战。在长期的艰苦的抗战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岗位，是在抗战建国的最前线，一切行动，应成

为坚持不拔，英勇牺牲，克服困难，彻底抗战的模范。中国工人阶级过去和现在均是站在民族解放的先锋的模范的地位，将来更要顽强地站在先锋的模范的地位。

二、发展与统一工人运动，是于抗战建国有利的事业，是每个爱国男女都应促其实现的，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更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大家都应爱护与集结这一民族力量。反之，分散与抵消这一力量，即是对民族的罪恶行为，因此，在每一个工厂矿山，每一地区，每一抗日根据地，只应组织一个统一的群众工会，或另一种形式的统一组织，在必要时，可以用各种形式组织工人，以建立统一组织的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因日寇的野蛮占领，把中国在形式上分成若干不同的区域，我们只有依据各种不同的区域和政治环境，进行艰苦的、耐心的组织工作，从实质上向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从抗战胜利的过程中，获得职工运动在形式上与实质上的统一。

三、组织工人的方式上，应该依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运用一切可能去参加或组织各种的工人团体，进行各方面的组织与教育工人的工作。

甲、在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必须运用各种方法方式，加强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组织工人阶级并教育他们，善于保持力量，蓄积力量，巩固与扩大已有的阵地，准备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乙、在某些将被敌人占领的城市中，应该在短时期内准备动员最大部分的工人去参加乡村的游击战争或民众运动；留下的应该只是必要的与可能存在继续工作的力量，以便继续地在群众中工作。

丙、在华北及一切可能组织工会的地方，应该尽可能把工会组织起来，吸收大多数的工人于工会之内，与农民及一切抗日团体结成亲密的关系。

丁、对于各地抗日各党派所领导的工会，我们应该赞助他们，领导工人去参加这些工人团体，帮助他们扩大与充实，拥护他们工

会内部的民主并发扬之，实现国民政府的普及劳工教育，安定劳工生活的战时保护劳工方案（1938年11月11日公布的）。特别是要用各种方法，争取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及其他法令中所给予的民主自由的实现。

四、国防工业的发展，是在持久抗战中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们工人要用一切方法去帮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并使整个国民经济合适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必须提高生产，反对浪费，保护产业，以表示我们工人拥护政府抗战的热忱！对工人物质状况的相当改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启发工人群众对争取抗战胜利的热忱的必要条件。要反对某些不明大义、只顾私利、阻碍抗战建国的一切罪恶行动。

五、加强民族革命主义的教育，提高工人阶级政治文化水平，把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内在地联系起来。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与阶级利益，是相符合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中国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也就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只有民族的彻底解放，才能获得阶级的彻底解放。以这样的观点，教育与说服工人群众，不要因为汉奸汪派托派及个别顽固分子制造摩擦而动摇自己的信心。相反的更要提高自觉性、纪律性与组织性，更加强其彻底性、顽强性与胜利的信心，以与这些民族败类作坚决的斗争。

六、培养与训练工人干部。从民族革命运动中，培养新的积极分子及群众领袖，调剂新老干部的优缺点；吸收工人干部参加适当的、各方面的实际活动的工作，并经常在政治上工作上教育他们，这是使我们的工作向各方面正确发展与巩固的保障，是我们党与工人阶级密切联系的枢纽，是目前工作中最中心的一环。

七、肃清敌探及托洛茨基奸徒在工人运动中的阴谋破坏，这比其他部门及其他阶层更属重要。因为他们卑鄙的行为、左倾的词句、毒辣的手段，勾结凶恶的日寇，不明大义的资本家，同工人中的落后分子，结成一气，向工人阶级进攻，并利用工人阶级的某些弱

点，如行会观念，地方界限等等，破坏工人的团结。因此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警惕性，经常揭露敌探、托派、汪派、汉奸挑拨离间的阴谋伎俩，以达到肃清他们在工人群众中的任何阴谋破坏的活动。

八、联合世界各国职工团体及反战反法西斯的人士，共同反对法西斯强盗，实现国际行动的统一。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

我所过的“五一”^{*}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在中国，“五一”运动与职工运动及革命运动是分不开的。所以，“五一”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日子。

我知道有“五一”节，是十九年前的事。当时有一个同乡在武昌读书，从他寄回的信中，知道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后来他回乡办了一个浚新小学，在那小学举行了“五一”纪念会，我才知道有一个“五一”节。但当时听了他的报告，还以为是海外奇谈。他说美国有一个叫芝加哥的地方，那里的工人在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那天举行示威运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这个运动得到了全世界工人的响应，到一八八九年七月第二国际开成立大会时正式决定以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以前资本家看不起工人，把自己当做工人的衣食父母，认为工人是没有什么力量的。自从那时以后，工人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工人的力量也就一天比一天大起来，变成“劳工神圣”。资本家也怕起工人来了，有许多地方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现在苏联的工人已革命成功，推翻了旧社会，工人自己组织政府，自己来管理国家大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时我听了这番话，心里很高兴，但是半信半疑：外国工人竟有那么大的力量？认识还很模糊。

在这以前我是不愿做工的，常想改行。以为工人是没有出路的，有时想做小买卖也比做工人好。自从湘浦^①他们由外面回来，

* 这是张浩同志在工人学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发表的演说。

常常说起“劳工神圣”的道理，同时又有大学生、中学生和教员同我交朋友，觉得有人看得起自己，做工也还不错。

到一九二一年，我决定由做工来闯一条出路。但我不愿在自己的乡下做手工业，当时不少人也劝我到外面去找工做。于是我就到上海，在上海日本人开的龙华染织厂做工。那厂里共有十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小学徒。那日本小学徒和我们的关系很好，常带我们到他家里去。他的母亲好似做劳工运动的，与一般日本妇人的态度不同，常对我们说做工好。在“五一”那天，我们合照了一个相，在相片上题了“劳工神圣”四个字。那小学徒年纪虽比我们小，但知道的事情却比我们多。他常说日本每年“五一”，工人都要举行示威，日本当局非常害怕工人，那天要到处戒严。他有一个幻想，以为“五一”是全世界工人革命的一天，有一天全世界的工人一齐起来示威，把压迫工人的资本家赶走，世界就是工人的了。因为这样，我们的关系更密切起来。有一天，他妈妈要回国，定要我送她上船，使我至今也忘不了。

一九二二年的“五一”，我在汉口模范工厂做工。当时职工运动在武汉达到最高峰，“五一”节也最热闹。那时汉口有三个报纸是属于我们的。如《真报》，由湘浦、施洋二人主办，有点像今天的《新中华报》，是一个地方党报。此外有一个《湖广新闻》，张子余^②主编。《日日新闻》，李求实主编。因为这三个报纸，汉口人力车夫的罢工，长辛店工人的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些消息几乎都集中到了汉口。那年的“五一”纪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武汉三镇的工人、学生都到武昌阅马场来开会，并庆祝第一次劳动大会召开。会后，就在武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示威游行。当时统治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害怕工人起来，想要禁止，但他们还不敢撕开“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所以没有出兵干涉。

“五一”之后，武汉工潮更加高涨。汉阳兵工厂、扬子机器厂、造币厂、大冶铁矿、京汉铁路接连发生大罢工，推动了全国的

职工运动，成立了许多重要工会，如汉冶萍总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粤汉路工会、邮政工会等。当时颇有“劳工神圣”压倒一切之势，加以学生也参加游行罢课，声势更大，使工人更加兴奋。

一九二三年的“五一”，我在长沙织布厂作技师。当时是“二七”惨案之后，工人运动到处遭受压迫，工潮一时低落下来。汉口《真报》被封，“潮广”与“日日”两报改组，许多同志被捕。我们在武汉站不住，有的到上海、安源，我则到长沙。此时工人运动在上海、武汉与北方一带虽低落下来，但广州却高涨起来，而长沙则保持原来状态。当时在长沙活动的人有毛泽东、罗迈（即李维汉）、夏曦、夏明翰、易礼容、谭影竹^③等，“五一”时未进行活动。当时利用赵恒惕与吴佩孚、萧耀南的矛盾，工会未被压迫下去。纪念“五一”的中心口号是反对“二七”惨杀，反对军阀萧吴，援助被难家属。“五一”后长沙发生人力车夫减租运动，群众推我为总指挥，率领工人游行示威，并到实业所请愿，情绪非常热烈。大家看见总指挥不吃饭，于是大家也不吃饭，坚持到晚上，非得到答复不散。此时适逢金家码头，戴生昌码头查禁日货的学生被日本人打死，群众更为愤激，工人、学生纷纷请愿，连夜举行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人力车老板迫于群众的压力，结果答应了工人要求的条件。

一九二四年“五一”，我在安源。当时安源工人运动做得更好，刘少奇、李立三、朱锦堂^④等在那里领导，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我当时在合作社工作。“五一”时推我当总指挥，因为要指挥一万多路矿工人，要作报告，觉得担子太重，不知说什么好，一夜也未睡。到第二天，厂方怕极了，许多职员关起门不敢出来，散布许多谣言，说工人要在“五一”暴动。由此可见当时安源工人力量的强大。那天各处工人整队前来，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由山后到萍乡，穿过铁路，走了一个大圈，情绪非常热烈。当时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经济绝交”，“取消‘二十一条’”等。“五一”运动已与中国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到一九二五年，工人运动又高涨起来。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劳动大会。此时工人阶级已参加国民革命，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任务，确定工人阶级为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大会代表回到各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五卅”运动能使全国都起来响应，就是具体的表现。大会并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工人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当时派了二十余人到苏联去学习，内有工人萧石月^⑤、关向应和我等数人。这年的“五一”我是在莫斯科过的。当时看见红场庆祝“五一”节的热烈场面，更增加了自己的信心。

一九二六年的“五一”，我是在上海过的。头年冬天，我们在闸北青云路举行反段示威^⑥，我因为打冲锋，头被打破，群众有被驱散之势。我既被打伤，就倚死卖死，仍招呼工人开会。开会时我演讲不到一半就昏倒了。大家以为我死了，就抬尸游行，军阀也怕起来了，连忙派人来调停。这年“五一”，在广州开第三次劳动大会，到会代表五百余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一百二十多万。接着，上海举行“五卅”周年纪念，比“五一”还热烈，有七万工人参加罢工。在六月一个月内罢工一百余次。此时在上海有组织的工人有二十余万，但工会还不能公开，在秘密条件下的工会成为不露面的“王”。这就是一九二七年上海三次暴动的基础，而这就引起了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恐惧和大资产阶级的仇视。英、美、日帝国主义就利用中国资产阶级新右派，制造广州的“三·二〇”事件和上海的“四·一二”政变，导致国共分裂。

一九二七年的“五一”，我是在武汉过的。当时武汉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在汉口后湖举行大会，参加的群众有三十万，并有国际代表团参加，为中国“五一”史上最大的一次。当时武汉有组织的工人约三十万，武装纠察队就有五千。工人威信很高，似乎天下就是他们的。那天发生“左”倾幼稚的情绪，在街上去剪人的长袍子。此后国民党“左派”叫喊工农运动“过火”，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也跟着附和。不久国共分家，引出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

一九二八年的“五一”，我又是在安源过的。那时我与滕代远、贺昌等在安源组织湖南省委。后滕代远被派到平江去工作。何键要来搜山，风声很紧急，留下我在那里以便接头。“五一”那天在严重警戒中举行了一个小的纪念会，并讨论了如何避免敌人的惨杀和加强与井冈山联系的问题。那时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湖南幕阜山脉暴动，不久何键果然派军队来搜山，迫使我作了短期的和尚和过讨饭的生活。

一九二九年，我在上海过的“五一”。那时刘少奇当沪东区委书记，李富春当法南区委书记，何孟雄当沪中区委书记，我当沪西区委书记。“五一”那天只开了一个小会，没有执行李立三的盲动指示。“五一”后，有一天，我经过沪西外国营房门口，旁边放着一口棺材，家属的哭诉又悲又惨，并在痛骂外国帝国主义。我觉得有点奇怪，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死者是沪西老虎灶工人张学良。他的小儿子被外国兵捉去鸡奸，他到兵营去抢救儿子，被外国兵打死。于是我告诉他的家属暂时不要埋葬，并带了他们到各学校团体去公开活动。沪西建设大学首先罢课响应，接着邮政工会及其他学校团体也纷纷响应，并在邮政局，开了一个追悼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张学良惨案。结果是迫使英人赔偿二万元给他家属了事。这一机会当时并未抓紧，却放下另去发动“五卅”纪念活动。在“五卅”大示威时，我看见巡捕毒打自己的同志，怒形于色，要去救援，被巡捕抓住。我不愿如绵羊一般的被缚，与巡捕搏斗起来，因此被捕后几乎被打死。后来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把我释放出来。

一九三〇年的“五一”，我是在哈尔滨过的。在四月中，我被调到东北。在哈尔滨时，住在一个白俄的旅馆。“五一”时决定与韩国人联合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并决定去打日本领事馆。那天韩国人到的很多，大家用石块把日本领事馆打得一踏糊涂。群众正走散时，日本人和中国军队赶到，把两个走得慢的韩国人捕去，其余的韩国人见了都要跟他二人去，结果三十多人被捕。这次“五一”行动，犯了盲动错误。

当天晚上就在我的房里检讨“五一”的经验教训。房里拥满了上百个人，不意查店的警察来了，把门一开，以为有人在房里开会，就把门反锁起来，派人回去报告。我当时是以贩木商出面和他交涉，他仍不肯把门打开。于是我对茶房发脾气，要他拿茶给客人喝，乘机把门弄开，大家一拥而逃，只有两个人被捕。

一九三一年我在东北牢里过“五一”。一部分政治犯要在“五一”那天有所举动，企图炸牢出狱，闹的很凶。我当时反对那样过“五一”，因为在敌人手里，狱中的斗争要尽可能灰色些，不一定要利用“五一”。因此，我只能和同案的一批人，在“五一”那天决定了一致的口供和对群众工作的计划。“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花了三百块钱我才被释放出来。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这几年，我都是在苏联过的“五一”节。一九三六年则在瓦窑堡过的“五一”节，那天检阅军队。自己由一个老百姓而到检阅自己的军队，这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一九三七年自己变成带兵的了，在镇远开“五一”大会。一九三八年在泾阳安吴堡过“五一”节。当时成立职工大队，这是今天工人学校成立的基础。

回顾二十年来过“五一”的情景，可以清楚地看到“五一”与中国职工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密切联系。“五一”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奋斗的节日，也是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节日。

注：

- ① 湘浦，即林育南（1898—1931）。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全总常委兼秘书长，团中央委员、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牺牲于龙华。
- ② 张子余，湖北襄樊人，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顾问，“二七”惨案后脱党。

- ③ 谭影竹，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一年曾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沙地委书记，从事过工人运动，后叛变投敌。
- ④ 朱锦堂，安源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曾任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书记、庶务股长、裁判委员会委员长、窿内主任等职。一九二五年在党的“四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脱党。
- ⑤ 萧石月（1898—1927），原名时杰，湖南常宁人。一九二一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部长。同年秋与张浩等赴苏学习。回国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中共新化锡矿山地委书记，在党的“五大”被选为中共候补监察委员。“马日事变”后，英勇牺牲。
- ⑥ 反段示威，是指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发起在闸北青云路东方大学门前广场举行的反对段祺瑞执政的万人大会和示威游行。

五四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一、“五四”普及到偏僻的乡间

记得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底的时候，我正在汗流浹背地浆纱，乐浦^①笑嘻嘻地告诉我说：“你拿什么东西谢我？”接着说：“我到回龙山去买东西，记起了你托我的话，到邮政代办所去看是否有湘浦的回信。果然不错，有一封从北京来的单挂号，我拿着就一口气跑回来了。快看！不，快念给我们大家听！”我当时不自觉地很快地用抹衣把手拭干，又用袖子把眼上的汗擦了一擦，拿着信便带看带念：“八哥^②：前回告诉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完全失败的事情，把我们大家气死了，末后大家商量，气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大家干！我们今天都到了天安门去开示威大会，又蜂拥到赵家楼去打卖国贼；曹汝霖的房子被我们烧了，章宗祥被我们打了，我今天才看着我们群众的力量！……我再告诉你，我们有很多的同学被捕去了，我也只差一点，就被捕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我们要干到底，亡国奴不是人当的！八哥！你记得韩国亡国惨痛故事么？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你们在乡下也干起来吧！……”我一口气念下去，有时高兴地笑着，有时咬着牙齿发气，最后鼓起劲来似乎也要决定干的样子。当时湾下的人听说北京“本儿”^③回了信，又看见乐浦气得哭了，以及我念信时的那副神气，于是越集越多，要我再

* 这是张浩同志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写的。原标题是《感想与回忆》，载一九三九年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卷第二期。

念一遍。我于是又带念带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听了又气！又恨！又喜！又怕！气的是洋鬼子不讲道理，恨的是卖国贼不争气，喜的是那些学生子不错，怕的是做亡国奴！大家听了之后，有一部分人确实想干，但因为不知道怎样干，干来干去，干不出一个头绪来，反碰了许多的钉子。不过在碰钉子的过程中却把我们三人结得更紧了一些。其他的人仍然是做工的做工，种田的种田，打牌的打牌，玩的仍然是玩，结果只落得“两个湾里三个好人^④”的一句评语！

二、乡下来了一群特别的人

快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回龙山看见一个学生背着一个大包袱（有人说是一袋面，有人说是他自己的行李），大踏步地旁若无人地直向前走去。大家都看着称奇！后面正有许多大人小孩跟着他跑，想看一看他的面孔。我问旁边的人：他是谁？才知道他就是刘吉山，^⑤是有名富户戴家冲刘家的少爷，在武昌某中学念书，因放年假回家。他家原很有钱，为什么刘少爷要自己背东西？我不明白！大家都不明白！有人很关心地说，恐怕是疯了！

过了几天湘浦也回到家乡来了，我们会着了，高兴得要死！我告诉他：我们在乡下碰了许多钉子，始终干不起来，说时很觉惭愧！他一面安慰我，一面详说，他们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结了很多的朋友，北京也有，武汉也有，湖南也有，并说他们在武昌横街开了一个利群书社，他最高兴的，是一个姓恽的朋友，他说他当教员同我们当学生的交朋友，他家里穷得要命，他自己赚的钱只留下一小部分给家里吃饭，其余的都拿来帮助穷学生念书，他的主张怎样好，办法怎样多，并说到他们想在我们乡下办一个小学校等等。这一段话把我听出了神：心想如今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坏人？可惜我不能早会着他，不能够得着读书的机会，真是没有“运气”。自此以后，我总是想着那个姓恽的！

湘浦回来以后，有许多念书人找着我交朋友，我总有点莫名其妙！湘浦到他念书的的朋友家里去，经常总是要我同他一道儿去。

有时候我也同去。有时候到太有钱的人家，我总是不敢去，甚至到了门口我还是不敢进去，到了那些人家以后，我总是忐忑不安！湘浦经常向我解释说：“你不要说你做工是下等人，不配同我们在一道儿！其实我们这些人靠着父亲赚些黑心钱来念书，吃好的喝好的，过寄生虫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下等人呢！你们做工，从小处说是自食其力，从大处说，社会就非有你们不可，你们才真正是上等人呢！俄国的工人，不是正在管理国家么？”我想想也不错，后来大家都同我很要好，我也慢慢的习惯了。有一次我会着刘家大少爷，我问：“你为什么要自己背行李回来？”他说：“你还不知道么？劳工神圣！要是在去年，我们都不会同你做朋友呢！”

一九二〇年春，学校办起来了，获得了我们户长大伯的帮助，我也算是发起人之一，地址设在白羊山八斗湾的一个家庙里，起名“浚新小学”。教员起初是一个姓胡的^①，后来这位教员被杨家岭刘家用钱抢过去了，于是又从武昌请来了一个不要钱的唐际盛，^②是姓恽的和湘浦他们的朋友。我初次问他：“唐先生是哪里人？”他说：“岩下！”他像一个基督教徒一样，同什么人都要好，特别是对老年人小孩子合得来。大家很相信他，把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送到学校里去念书，好象是忘记了唐先生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似的。

三、到青年学生和产业工人中去

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育黎^③育蓉^④来说：“八哥！学校来了客人，叫你去！”我问是哪里来的？姓什么？他们说：“汉口来的，姓恽。”我就赶忙的一口气跑了去，到了学校，看见一个人穿旧蓝布长褂，很细长的袖子，一个和尚头，人同脸都是瘦长瘦长的，戴一架眼镜，如果把这架眼镜去掉，或者是换一架旧式的玳瑁镜，则活象一个“游学先生”。我看见他站着又说又笑的，时常把手抹汗，我有点“那个”，好象不象我所想象的那个姓恽的一样。还有两个坐在旁边听着，笑着。湘浦笑着告诉我说：“这就是你常想会着的那位姓恽的先生，他的名字叫做代英！”他立即笑

着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工人朋友么？好极了！好极了！”接着刘光国^⑧、卢春山^⑨等二三十个人都来了，我们生活在一块儿，总是热烘烘的被他吸引着，就连他在吃饭的时候，也常是说着笑着！虽然过着很艰苦的生活，因为内中大部分是很穷苦的学生，但我们都觉得有无穷尽的光明的前途！我们有时候高兴起来，想吃东西，于是大家约着打“拼伙”^⑩到几里路外去买花生吃，他们说这是对穷光蛋，最好的东西，又便宜，又好吃，又补人！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开了好几天的会他们说的话，对我非常生疏，现在很难记忆，我只知道当时成立了一个共存社^⑪。会后有到武汉的，到四川的，到安徽的，都分散了！他们主张我到上海去做工。我过去以为做工是不得已的，从那时起，我就以做工为光荣了，也不怕“乡下人上街”闹笑话，决然的到上海日商××染织工厂去做工。当我从上海回到武汉以后，湘浦从远东大会回来，主张取消共存社，自愿的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情形顿然大变了：唐际盛在粤汉路的徐家棚，项德隆（项英）在江岸，许白昊^⑫在汉阳钢铁厂，我则从利群毛巾厂到武汉模范大工厂，湘浦同施洋办《真报》，求实办《日日新闻》，张子余办《湖广新闻》。实际工作的推动，报纸的鼓吹，武汉的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罢工斗争，不断的发生，轰轰烈烈，盛极一时，“二七”则成为这一高潮的顶点。我总记得：党派我到黄石港石灰窑^⑬去做代表，是代英去预支他的薪水凑成的路费（注）；我也不能忘记我当“交通”去汉阳探听钢铁厂罢工消息，提出一个“打死工贼韩老三”的口号，挽救了罢工，使之转败为胜。直到现在，我还念念不忘当“活交通”的味道！“五四”促进了“二七”，“二七”又推动了大革命！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纪念“五四”，回忆起“五四”到“二七”之间，同起同坐，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除极少数堕落消极者外，成仁的已经成仁，成功的也已经成功。我敬祝成仁者的荣名永世长青，我更希望成功者能踏着我们烈士的血迹，永远继续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象“五四”推动了全中国的一样！

在“五四”的二十年后，我敬以这段小小的回忆，献给我们的代英同志，献给“五四”以来为革命牺牲的民族的阶级的战士。

注：

- ① 乐浦，即林洛浦，张浩同高祖父的堂弟，利群书社、共存社的成员，黄冈浚新小学的创办人之一。后病死。
- ② 八哥：张浩在同祖父的十个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他的弟妹们称他为“八哥”。
- ③ “本儿”，即林育南，原名林祚本，号湘浦。是张浩同高祖父的堂弟，当时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林育南在信中转述了北京友人黄晓峰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
- ④ “两个湾里三个好人”指林家大湾和染铺湾的林育南、林洛浦和张浩三人。
- ⑤ 刘吉山，系卢吉栅之误，本名卢斌，又名陆沉，黄冈戴家冲人。当时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变沦为国民党特务。文中的“刘家少爷”也应为卢家少爷。
- ⑥ 姓胡的教员，即胡亮银（1890—1931）湖北黄冈人，共存社成员，一九二六年曾任中共黄冈县委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冬领导黄冈回龙山暴动。后在河南牺牲。
- ⑦ 唐际盛（1899—1926）湖北黄陂人。五四运动时接受新思想，参加爱国运动。后参加利群书社，参与创办浚新小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走于鄂、湘、川、沪、粤、豫之间，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入豫做国民党工作，后赴广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党务科长，因劳致疾，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病逝于广州。
- ⑧ 育黎，即林育黎，张浩的堂弟，浚新小学、共进中学学生，大革命时曾参加革命活动，后在黄冈女小教书，不久病故。
- ⑨ 育蓉，即林育蓉，名彪。张浩同高祖父的堂弟，曾是浚新小学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和抗大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成以他为头子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叛国出逃，机毁丧命。

- ⑩ 刘光国，湖北黄陂人，利群书社成员，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在上海病故。
- ⑪ 卢春山（1904—1925）湖北黄冈人，共存社成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庆《新建设日报》编辑，一九二三年在武汉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到黄冈办平民学校做农民运动，并任代理校长。一九二四年到安源路矿担任工人学校教务，并任安源团地委委员兼学生部长，一九二五年回武汉代理湖北团省委书记，同年十月二日病逝。
- ⑫ “拚伙”俗语凑分儿的意思。
- ⑬ 共存社，一九二一年七月在黄冈浚新小学成立。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是带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自行停止活动，其成员大多分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⑭ 许白昊（1896—1928），湖北应城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后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委员。在大革命时期先后担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在党的“五大”被选为中央监委委员。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英勇牺牲。
- ⑮ 黄石港石灰窑，即今湖北省黄石市。

作者注：

这给我留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从此，对于我们党是依靠党员的党费支持起来的这个事实，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工人学校开学典礼开幕词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

同志们：在有国际意义的充满了斗争精神的红五月里，我们工人学校正式宣布开学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创举，就国际范围说，除了苏联胜利了的工人阶级以外，也是少见的。斯大林说过：“干部决定一切”。培养训练大批工人干部，是保证抗日战争打到鸭绿江边，胜利地实现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条件之一，将更是保证胜利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

工人学校的男的或女的工人同志，包括教职员，虽然还不满八百人，但是很有代表性。他们有的是从中国极东极北的山东、河北、平津、辽宁、哈尔滨、热河^①、绥远^②等地来的；有的是从中国极西极南的海南岛、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甘肃、云南、贵州等地来的；还有的是从美国、法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等地回来的华侨工人；更有的是从安南^③暹罗^④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工人或共产党员！至于山西、陕西、湖南、湖北、安徽、四川则更不要说了。我们这一群工人中间，大部分是铁路、兵工厂、矿山、纱厂、市政等产业工人，是北平、天津、上海、武汉、青岛、广州、桂林、太原、西安、郑州、重庆等地的城市工人，并且连大洋船、沿海船、内河船的海员、码头工人都上山了！他们包括中国二十一省（市）、八处华侨工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工人，包括七十三种职业和产业。这一群工人中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参加过大大小小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斗争与救亡运动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是曾经做过主要的或相当的领导工作的。在文化程度上

说，有半数以上是高小或中学以上的程度。我们派到马列学院的男女九人，据王学文^⑤告诉我：他们并不落后。这是大革命时所没有的。如果连我们的老同志朱宝庭^⑥也算上的话，则我们里面包括有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大罢工的领导者或参加者：如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反日大罢工；一九二二年的香港、上海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武汉罢工高潮；一九二三年的“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五卅”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广州起义；一九三四年美亚丝织厂大罢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上海的反日大罢工等。更宝贵、更光荣的是在十年白色恐怖之下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许多同志把讨饭、被捕、坐老虎凳、灌冷水、上大吊、灌辣椒面等酷刑以及坐牢五年至十年以上当成很自然很平常的事。如我们的朱宝庭同志、刘林元同志^⑦等。这种临危不惧、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为民主共和国、为共产主义的最高信仰而牺牲一切的英勇气概，显示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是我们学习的光荣模范。以上这些优秀的工人代表汇集到工人学校，不仅是我们工人学校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而且最有力地从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中央虽然是住在工业落后区域的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它主要的基础与政治影响，则是在全国主要产业区域与中心城市；它是继承着工人阶级一切光荣传统的！这种铁的事实，粉碎了托派、汉奸、顽固分子只从形式上看共产党，说：“它已离开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谰言。相反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策的本质上，是真正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是真正得到全国各地主要产业区域与主要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拥护的政党，是真正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锋”！如果我们再把抗大、党校、马列学院的优秀工人代表计算一下，则更可证实这一点。

中国工人阶级毕竟是年轻的，并且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有形无形的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加之中国政治上的缺乏民主自由，以致某些精神上丑恶黑暗的束缚，一时不能解脱，

我们要解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家对我们的三层压迫，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极复杂、极困难的任务，我们就必须遵循列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遗训，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武装我们自己！

中国的革命，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是有一个很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的。我们年轻的工人阶级的意识中，夹杂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成分，因而时常容易发生无原则的纠纷和不应有的摇摆现象。要使我们能够经得住比过雪山草地还更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必须遵循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艰苦奋斗的指示：要锻炼！锻炼！再锻炼！把我们锻炼成铁，锻炼成钢，锻炼成能软能硬、能屈能伸、无处不适的钢丝和钢锭！达到培养抗战中的工人干部，特别是要培养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政策的干部的目的，以便完成在各个不同区域的各种不同的复杂任务。因此，我们的教育方针是：

1. 通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把学员的思想提高到真正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水平。

2.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使之认识目前运动的规律。

3. 加强党的建设、革命职工运动与农民同盟的必要性的教育，以便于掌握实际运动的方针与方法方式。

4. 真正无产阶级的创造性、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养成，艰苦奋斗作风的锻炼，正确的民主的习惯的培养。

总之，我们要深刻地了解：工人不是招牌，而是实际行动的模范。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要向下看齐，在精神与政治方面，要向上看齐。我们的一切举止行动均要提高到马列主义的原则上。

同志们：工人学校今天哇哇的出世了。它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产生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十七年来英勇斗争的产儿。希望大家好好地抚育它、爱护它、帮助它、教育它，使它能够担负起应有的历史使命。我希望我们的领导，我们的来宾，多多给我们指示。我更希望我们的同学要努力地身体力行！

谨致革命的敬礼！

注。

- ① 热河，原为一个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 ② 绥远，原为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 ③ 安南，即越南的沿习称呼。
- ④ 暹罗，即泰国的旧称。
- ⑤ 王学文（1895—1985），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的经济学家。江苏徐州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1937年到延安，当时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
- ⑥ 朱宝庭（1880—1947），浙江宁波人，海员出身。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领导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太平洋职工国际委员、海员职工国际委员等职。一九三一年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抗战爆发后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七年病逝。
- ⑦ 刘林元，滇黔铁路工人，当时任工人学校党总支书记，解放后任云南省副省长，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

汉阳钢铁厂罢工斗争的坚持与胜利*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二二年秋初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同志，正在武昌大堤口的利群毛巾厂很紧张地工作着。忽然进来一个神气十足的青年，他进门便把皮包放下，帽也不脱坐下来。大家便围着他问：

“钢铁厂的问题怎样了？”

“已经解决了。”他很爽快地说。

“怎样解决的？”大家一齐追问。

他说：“开除了领头的七个工人。”

湘浦、白昊^①不觉同声质问他：“工人们的意见怎样？那被开除的七个工人领袖现在哪里？”

他说：“工人当然不愿意，那被开除的七个工人仍在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里；但有什么办法呢？”

湘浦说：“这正是问题发展的开始，不是问题的解决，你想：正当工人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又开除了七个工人领袖，这不是火上加油吗？”

白昊对湘浦说：“还是我们两个亲自到江岸项德隆同志^②那里去

- * 这是张浩同志写的工运回忆录之一，原题为《打死工贼韩老三》，曾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中国工人》第十二期。在这以前，他还写了一篇内容相同的文章，题为《两个先进青年》。《中国工人》杂志创刊后，张浩同志曾计划按期为该刊写些工运回忆录，但是不久他就一病不起，以致未能通过回忆录将他一生丰富的工运经验和斗争故事写出来，殊为可惜。

看了再说。”于是他们两人连忙把服装理了一下，扮成半像工人半像学生的样子，出门走了。

当晚风雨大作，长江浪涛汹涌。小筏子随着浪涛起落，好象时而沉入江底，时而又推到江面，真叫人胆战心惊。夜深了，还不见他俩回来，我坐着不安，睡呢，又睡不着。我担忧着他们为狂风巨浪所淹没，心情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想着被开除的七个工人领袖。他们的被开除，使得斗争着的工友们愤怒，同时也使得他们恐慌；他们失业使得他们对资本家更加痛恨，同时也使得他们的老婆孩子啼饥号寒。回想我自己失业时的情景，仍觉不寒而慄。因此，我当时想：即使湘浦他们回不来，我也应该领着工人们斗争下去。可是怎样斗法呢？我又没有具体的办法。我曾经听湘浦说过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故事，特别是施洋领导汉口人力车夫罢工的故事。我想着，人力车夫团结起来了，都有那样大的力量，其他大工厂的工人当然更有力量。也曾听到湖南华实纱厂罢工，黄庞^③被赵恒惕惨杀的故事，我们痛恨赵恒惕的残暴，同情黄庞的被惨杀。觉得这样的死，比那“做工，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做工”地活着，牛马样地活着，要好得多。何况，吃饭吃不饱，睡觉睡不足，想做工还没有工做，失业无救济，老死无棺材呢？！我诅咒这种奴隶的、牛马的、饥饿的生活。我要打毁工钱奴隶的锁链。我愿意死，愿意为打毁工钱奴隶的锁链而死，更愿意在为着打毁工钱奴隶制度的人山人海里去死里求生。我们不愿再做奴隶，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湘浦是不久前从远东代表大会回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应该怎样走呢？必须经过些什么？采取一些什么具体办法呢？却又茫然。我脑子里在不停地翻腾着，想着正在斗争的工友、被开除的七个工人领袖及其家属，更想着被狂风巨浪所袭击的两个先进青年！

到了半夜，脚步声，谈笑声，拍门声，继续不断的来了。我赶快下楼开门。看着象水淋鸡似的、生气勃勃的两个青年，我如释重负。湘浦立即笑嘻嘻地告诉我：“今天我们两个危险极了，同时也好玩极了。我们上筏子不久，风就起来了，筏子只好随着浪跑。接着

雨又来了，筏子在狂风暴雨中随着巨浪钻来钻去，水又流得很快，把我们的筏子打到徐家棚下面去了。船夫划又划不动，靠岸又靠不了，我们只得冒险跳上岸来，帮他拉船。白昊跳不远，险些儿淹死了呢！”我的眼睛立即转到白昊的身上，看他胜利而快乐的不出声地笑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象他俩今天这样快乐的人。我想：冒险固然是危险的，同时也是快乐的，这正是革命者的生活。白昊一面擦身上的水，一面同我说：“会着了那七个工人领袖，他们都很好。他们说，只要有办法，他们愿意坚持干下去。全厂的工人很齐心，很激愤。京汉铁路的工友们又表示愿意帮忙，厂方的生意还不坏，吴佩孚、萧耀南现在正想利用工人。我们认为这是开展今后职工运动的有利时机。香港海员胜利的大罢工，上海两个胜利的罢工，都没有推动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工运。我们仔细考虑了主客观的各种条件之后，决定赞助他们坚决的干下去。现在已提出了十七个条件，决定明天早班便开始罢工。明天早晨起来，请大家注意看看那边的烟囱，将要停止冒烟了。”

次日我一早起来，就跑到江边朝着汉阳望去，果然除一个大烟囱外，其余的烟囱全都不出烟了。我高兴得险些叫出来。我马上回去叫醒湘浦、白昊，并告诉他们只见大烟囱还在冒烟。他们听了虽觉高兴但怀疑那个大烟囱为什么还继续冒烟呢？他们立即起来，也跑到江边去看，见钢铁厂的大烟囱依旧悠悠然冒着浓烟。他们想把真象弄个明白，打算过去看一看，但又不知戒备的情形，就派我过去打听。

那时，我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里，对外是利群毛巾厂的老板，对内是经理，跑堂扫地、漂染毛巾、推销产品，都是我的工作。此外，还兼了交通工作。我当时对于秘密活动的交通工作很感兴趣。白昊叫我过去打听消息，我立刻答应。

“罢工”两字虽然听说了无数次，可是亲自参加大产业罢工活动，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我从洗马口码头上岸，就看见许多工人交头接耳，面上都带着很紧张的情绪，好象发生了什么事似的。我跑了几个地方，坐了好几个茶馆，才把大烟囱冒烟的原因打听

出来。原来钢铁厂里有一个最大的化铁炉，它掌握全厂生产的命脉。如它仍继续开工，则其他部分的工人虽罢工，对厂方并没有很严重的威胁，只有大化铁炉停工下来，才能迫使厂方非在短时间内解决工潮不可。因为这个大化铁炉如果停一星期不升火，则整个化铁炉就会凝结成一块废铁。因此，厂方用尽各种方法，去收买工贼，欺骗工人。大化铁炉的工头韩老三，被厂方收买，不服从罢工委员会的命令，继续升火开工。一般罢工工友都知道大化铁炉不罢工，将会影响罢工的成败，到处议论纷纷。我探得这个消息后，就到预先约定的会面地方——罢工委员会——找白昊，大家听了我的报告，就紧急讨论应付办法。有的主张：仍让它开工，假使化铁炉毁了，全体工人将要失业。有的主张：让它毁掉，要塌台就都塌台，他舍得那样大的资本，我们就拼着失业。白昊看着他们两方面争不出一个结果，于是他发表意见：

“让化铁炉继续开工，则这个罢工将遭失败；让它毁掉，则全体工人将要失业。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好的办法。目前最好是能把化铁炉的工停下来，迫得厂方不得不在几天以内答应我们的条件，这样不致使化铁炉毁掉，而工人不独不致失业，并且可能得着许多胜利的条件。这次罢工斗争如果胜利了，一定要影响全武汉的工人，他们将随着我们起来斗争。”

大家一致赞成白昊的意见，开始讨论执行的具体办法，有的提议：写一个告化铁炉工友书，劝告他们自动停工，有的主张去硬打。正议论纷纷时，白昊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对工贼不要太文，对工友们不要太武，以免引起以后的不和气。现在坏的是工贼韩老三一个人，并不是化铁炉的全体工友。所以我以为只提出一个‘打死工贼韩老三’的口号就够了。这样一来，不独唤醒已罢工的工友去惩罚他，就是化铁炉的工友也会起来打死他。”大家都赞成了这个意见。

散会后不久，汉阳的大街小巷，就连化铁炉里面，都满布了“打死工贼韩老三”令人刺目的标语。韩老三看见形势对他不利，果然不敢出面，化铁炉罢工实现了。不出所料，厂方一见化铁炉停了

升火，不得不连忙答应工人的条件。这次工潮前后只费了五天的时间，就完全胜利了，那被开除的七名工人领袖，不独恢复工作，并且都当了工会的执行委员。当时白昊在钢铁厂工人中有着极高的威信，钢铁厂工会坚决要求白昊去做工会的秘书。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则成为他们公认的领导机关。

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已普遍于全国各重要城市。现在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就是当时湖南分部的主任。广东是冯菊坡^①、济南是王煜美、华北是邓中夏同志。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破天荒地在中国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融合起来。

在七月汉阳钢铁厂罢工之后，果然不出湘浦、白昊等所料，接着有汉阳兵工厂、扬子机器厂、英美烟厂、花厂等厂的罢工，澎湃的工潮，更向华北蔓延。八月就有长辛店胜利的罢工，使京汉路全部享受了九个条件。随着有京奉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罢工，粤汉铁路武长段全路罢工，唐山制造厂罢工，京绥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津浦路浦镇机器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罢工，粤汉路徐家棚工人罢工，京汉路刘家庙车站反对士兵打工人的罢工等等，都是胜利的罢工。由于钢铁厂罢工的胜利，而影响到安源路矿的罢工，因同在汉冶萍公司的一个产业下，使得厂方不得不承认十三个条件。至于开滦五大煤矿的十月大罢工，则更是英勇壮烈。总之，从七月汉阳钢铁厂罢工开始，掀起了罢工的高潮，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铁路罢工止，到处轰轰烈烈，真是中国职工运动向全国范围发展与高涨的年代。

注：

① 白昊，即许白昊同志。

② 项德隆。即项英（1898—1941），湖北武昌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总干事。

③ 黄庞，即湖南劳工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黄爱、庞人铨。

④ 冯菊坡，当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主任，后脱党。

纪念“二七”的意义*

(一九四〇年二月)

“二七”纪念，不觉已经是十七周年了。这十七个年头，在历史的观点上看来，并不算长，然而它在中国所经历的、曲折的路程，却比某些国家在一个世纪，甚至两个世纪所走的路程还要远。当我们每年纪念它的时候，我们总感觉它与我们的行动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每年都有它的新意义。它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温习、研究、总结，并用之于行动的。“二七”是伟大的。“二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二七”意义的伟大，首先在于它在中华民族的前面，很明显的举起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旗帜。“二七”惨案以前，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口号是不能为一般人所了解的，吴佩孚的“保护劳工”的欺骗口号，当时曾使一些人迷惑。“二七”以后，工人们得到了血的教训。某些工人对军阀吴佩孚的“信仰”也就在“二七”这一天被“枪杀”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变为全国人民的行动口号，并发展成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直到今天，仍为我们所要完成的基本革命任务。“二七”惨案的发生，就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失败的开始。

“二七”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我们工人要得到阶级的解放，首先就必须使全民族获得解放。不铲除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

* 本文是张浩同志为纪念“二七”罢工十七周年写的。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九十八、九期。

主义)与建封势力,中华民族是不能得到解放的,中国工人阶级同样是不能解放的。我们应当向“二七”烈士宣誓:我们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的岗位上,我们誓为民族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我们要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要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反对认贼作父!

第二,“二七”意义的伟大,就在于它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是站在中国人民的前卫的地位上,为争取自由,争取人权而斗争。京汉铁路总工会会所于二月一日被军队占领捣毁后,即于当晚召集秘密会议,其决议明确地说:“我们为力争自由起见,谨决于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而战,争人权而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的。”①

“不自由,毋宁死!”是当时普遍的呼声。中国工人从工资工时及改良待遇的斗争,进到争自由争人权的斗争,这表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进步之迅速。封建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等,残酷地压制了人民的自由,屠杀了为争自由争人权而斗争的先进战士。这样的独夫、军阀在不到两年之后便完全塌台,真是“万夫所指,不病而死”“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目前抗战三十个月以来,我们中国军事有进步,政治无进步!人民还没有绝对必需的民主自由。现在宪政运动的中心问题,是民主自由;开国民大会的中心问题,也是民主自由。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完成先烈的遗志的立场上,诚恳地希望国民政府当局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北上时所说的:

“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象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中山丛书》,第三册第二五九页)。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孙中山:《北上宣言》,同上,第四册第三十四页)。

这就是说要，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真正的三民主义共和国，就必须实现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民主自由，实现真正的人民的民主宪政。我们中国的人民，决不是“阿斗”，我们要求自决。孙中山先生依据“五四”到“二七”这个时期中间我们中国人民的发展与进步的程度，就提倡国民自决，十六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人民的自决，中国才能解放！

“二七”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发扬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事业中所应起的作用，首先就必须使工人阶级享受中华民国的国民所应享受的民主自由。现在某些分子的压制民主自由，将如过去曹、吴^②的压制民主自由同样地自食其果，“二七”志士“为人权而斗争”、“为自由而斗争”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的信条，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应当向“二七”的烈士宣誓：我们工人阶级，一定是为人权为自由而斗争到底的战士。我们决不愿过着封建专制独裁的、黑暗的、野蛮的生活，我们要协同各阶层的先进人士，为自由、为民权、为科学、为光明而战斗着前进，我们永远的记着，并实际的行动着，“不自由，毋宁死”！

第三，“二七”意义的伟大，就在它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当郑州会议时，不仅京汉铁路数万工人，全体一致派遣代表出席，即各路工人如津浦、粤汉、京奉等以至全中国的铁路工人，无不派有代表参加，甚至其他各地的工人团体如武汉、上海、广东等，均派有代表赴会庆贺，这已够证明中国工人团结一致的精神了。当郑州会议被压迫解散，京汉铁路总工会下总同盟罢工命令时，全路工人一致响应。虽然军阀走狗用尽各种威胁利诱方法，全路各站罢工工人不独一致地执行罢工命令，而且当时坚守着：“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开工”的口号。这一口号，当时成为京汉铁路工人唯一的口号与信条。“二七”惨案发生后，各地工人更是慷慨激昂，道清、正太及津浦南段都一致罢工援助，其他各路亦都表示参加，但由于军阀的武力压迫，他们的行动，未能实现。当时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曾发布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实行罢工的有粤汉路工

人，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扬子厂机器工人，丹水池工人；其他准备罢工而未成者，有武汉电话、电灯、自来水及其他工人。同时上海、北京各地的许多工会，对此次罢工运动，亦表示了热烈的同情！但他们的行动均为军阀武力所严防制止。至于其他各地工人团体、学生团体及许多先进人士，对于京汉路被害工人的救济，无不积极踊跃。以上这许多伟大的同情运动，这种团结一致，坚持到底的精神，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二七”是大革命时“五卅”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的前奏！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准备。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其阶级地位，由于其在大生产中的劳动条件，所以易于团结一致，工人阶级是我们中国革命最彻底最坚决的阶级。因此，得出以下的两个真理：一、中国工人阶级要完成自己所应完成的任务，首先便须团结自己的阶级，统一自己的行动。工人阶级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受他人的任何威逼利诱，不做工贼，不做走狗。工人阶级要始终坚持自己内部的团结一致！二、民族团结必须有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团结起骨干的作用，没有这种骨干作用，民族团结是不可能巩固与加强的。

“二七”的经验教训了我们：工人的力量，首先就在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无论是熟练工人、不熟练工人、成年工人、青年工人、在业工人、失业工人，智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职员学徒、南方的工人、北方的工人、中国工人、外国工人，更无所谓黄色工会、赤色工会、宁波帮、湖北帮等等，都是一家，都要联合起来。

“二七”时有两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就是“工人联合便成天”，“工人不分家”。这两个口号是深入工人心灵的口号，工人群众本身的经验证明，工人若不团结一致便没有解放的日子。工人若是联合起来斗争，便能担负起自己的伟大任务。许多工人象征地说：“工字与人字合一，便成一个天字，”当时甚至有的工友，“把工人联合便成天”的“天”字，当作自己的名字，把“工人不分家”当成彼此见面的口头语，“我们是自家人，我们工人不分家，”工人群众这种团结的精神，就造成了各种罢工斗争以至同盟罢工的基

确。我们应当向“二七”烈士宣誓：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始终要团结一致，要建立与巩固我们工人内部的、坚固的团结，我们要把“工人不分家”“工人联合起来便成‘天’”的口号，深入到每个工人的脑海里去，要把它当成行动的方针。

第四，“二七”意义的伟大，就在于它表现了中国工人的斗争力量与不怕牺牲的精神。从前一般人对赤手空拳的工厂工人，是非常贱视的，认为他们是靠人吃饭，是没有任何力量的。自京汉路宣布总同盟罢工后，社会上便立即感觉到中国工人有无限的威力，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当时是威风凛凛的，可是中国工人阶级却敢于起来与之对抗。“二七”罢工那时，正值旧历年关的时候，“二七”罢工，使平津与汉口的交通断绝，商人不能结帐，军阀官僚富商不能回家过年，货物不能运转，军队不能调动。加以武汉的同盟罢工，特别是电灯、电话、自来水等市政工人罢工的传说，更使武汉震惊，全国震动。“二七”清楚地表现了工人是有力量的，工人阶级有着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二七”惨案中牺牲的烈士，有三十九人，受伤者三百余人，其中有许多英勇壮烈、不怕牺牲的故事。如数十工人被萧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拘捕，捆在车站的电杆上，张厚生亲自提灯出马去拘捕林祥谦同志，质问段长说：“此人是否工会会长？”段长答“是”！张乃令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同志下上工命令。林同志不允，张乃令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林祥谦同志抗声说：“不上！”张乃令再砍一刀，怒声喝道：“你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林同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张复令再砍一刀，此时林同志鲜血溅地过多遂晕去，移时醒来，张狞恶地笑道：“现在怎样？”林同志切齿大骂：“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手里……”张听了大怒，不待林同志说完，立令杀死，割头示众，林祥谦同志就此慷慨成仁了！这样忠实于阶级，忠实于整个人民利益，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的精神，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才能有！

“二七”的经验教训了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具有着不可战胜的力量，具有着无尚英勇牺牲的精神，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正是今天为民族解放、为社会解放而斗争的骨干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战士所具有的美德，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优秀儿女所应当学习的，我们要踏着林祥谦同志的血迹前进，我们更要有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心。

第五，“二七”意义的伟大，就在于它锻炼了中国工人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坚定精神。“二七”以前，武汉工人不断地得着胜利，而兴高采烈，妄事铺张。他们不知工人阶级斗争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要经过不少的挫败。“二七”时候，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已在摩拳擦掌地寻找反攻的机会，曹、吴二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疯狂地压迫工人运动，“二七”惨案正是代表当时整个职工运动高潮的下降。“二七”惨案正教育了工人阶级，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使它知道怎样度过难关，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进行斗争，怎样利用机会，来恢复自己的阵地。正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得到了这样的教育与锻炼，所以在两年后的“二七”，即能又在郑州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汉路总工会恢复的宣言上说得好：

“我们早知道恶贯满盈的曹吴，必有崩溃的这一天，所以我们在高压之下，表面虽呈一种潜伏的现象，实际上我们不屈不挠的工友，秉承狱中领袖的意旨，始终一贯的努力。所以在政局变换领袖出狱时，我们京汉铁路总工会就轰然一声出人意外地恢复了！”^③

中国共产党在庆祝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的电报上亦说：

“‘二七’事件以来，铁路工友们备受军阀摧残，际此政局变迁，贵大会工友竟以艰苦奋斗之结果，能在两年前惨遭巨变之同地同日召集全国代表盛会，不胜欣喜之至。”^④

“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民族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阶级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我们要以坚持到底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要以无产阶级的坚定性，联合并发动民族的一切生动力量，来争取我

们民族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

第六，“二七”意义的伟大，是在于“二七”的行动开始证明：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坚力量，一个指导力量，同时又指明，中国无产阶级要获得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善于争取同盟军。

中国的封建地主、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等，早已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障碍。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原故，带有先天的软弱症，它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有一定的关系，它易于对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妥协。大家知道：北方的资产阶级，绝大多数包含有军阀、官僚、地主的资本；南方的资产阶级，绝大多数包含有买办资本，这种先天软弱的资产阶级，怎样领导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来把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呢？

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其人数在全国人口的比例上说还是比较少也比较年轻——可是先进的革命家，却恰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寄托于它的增长。这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与先进的经济形式联系着——与大生产联系着。因此，它有伟大的将来。

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最彻底、最坚决的革命阶级，可是中国无产阶级，只有采取必须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只有领导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才能获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中国革命的进一步的发展。

“二七”的经验教训了我们，争取同盟军的问题，对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二七”时，革命的知识分子，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武汉的《真报》、《湖广新闻》、《日日新闻》等报纸，各地学生们奔走呼号，施洋同志的舍身取义等等，在当时运动的发展上，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可是对于士兵，则完全没有进行工作，甚至对之还采取仇视态度，对于职员的工作，当时亦做得很不好，以致罢工后，消息完全断绝。农民问题则根本没有提到，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原谅的，但在今天我们纪念“二七”，我们就必须清楚记取这一教训，努力于争取工人阶级同盟军的工作。

第七，“二七”意义的伟大，就在于它指明了要发动工人群众

的积极性及其伟大的力量，就必须改善工人的生活。

“二七”事件以前，工人群众在胜利地改善生活的斗争中，相信了自己阶级的团结的力量，从京汉路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长辛店三千余工人争得全路九个胜利条件起，直到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粤汉路徐家棚二千余工人争得增加工资的胜利止，在这四个多月中间，不仅京汉路工人，而且京奉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粤汉路武长段的工人，唐山制造厂的工人，京绥路车务工人，石家庄机器工人，津浦路浦镇机器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等等改善生活的罢工斗争，均得着了胜利的结果。改善工人生活的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工人群众的伟大革命力量。

“二七”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想真正的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就必须时时刻刻关心劳苦大众的生活，就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改善工人的生活。

第八，“二七”意义的伟大，就在于它指明了：工人阶级要获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善于运用公开合法的斗争，必须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当吴佩孚提“保护劳工”的口号，并企图利用工人在铁路上打击交通系势力的时候，工人是相当地利用了这一口号以及统治阶级间的派系矛盾，在这方面铁路上的六个密查员^⑤，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必须对统治阶级的镇压与打击，提起最大的警惕性。例如在京汉路二月四号总罢工后，吴佩孚一面提出“保护劳工”的欺骗口号，一面加紧准备屠杀工人，帝国主义者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促其早下毒手，更在武汉开联席会议，协商打击我们、屠杀我们的具体办法，二月七日，便开始了大屠杀。

这指明，工人阶级在运用公开合法斗争的时候，必须时时刻刻提防统治阶级的镇压与屠杀，使工人阶级的本身力量，能够正确地保持与发展。

“二七”的经验教训了我们：统治阶级时时刻刻企图利用我们工人，更时时刻刻准备着屠杀我们工人。“二七”时是如此，大革命时也是如此！巴黎公社时是如此，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也是如

此！我们纪念“二七”，就要善于运用公开合法的可能，同时要更加提高我们的警惕性。我们要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我们要严防突然事变的到来。我们要勇敢地争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并保卫这一果实，我们更要有准备的、从容不迫的处理突然事变的到来。

第九，“二七”意义的伟大，就在于它指明了：战斗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只有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表现出它的伟大的力量与作用，这就等于一个强大的铁的军队，不能没有一个健全的指挥部、参谋部一样。大家知道，军队里没有指挥部、参谋部是不能打仗的。“二七”前汹涌澎湃的工潮，完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没有共产党，就不能有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这是很明显的。当时进行工会工作的同志的极大错误，就是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下层组织。总计当时铁路工人中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小的数目，当然很难领导那样广大的群众，这种情况，就使群众容易失去重心，就使党容易失掉与群众的联系。因而党的策略路线，不容易传达到群众中去。今天我们纪念“二七”，就必须大量吸收工人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到党里来，造成党内工人阶级的骨干。

第十，“二七”意义的伟大，就在于它的行动，是表示中国工人已走到国际无产阶级的队伍，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际主义的一支队伍。“二七”的罢工斗争，显然地为中国职工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次的罢工斗争，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共产国际当时对它的估计说：

“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了”。
(共产国际：《致中国铁路工人书》一九二三年二月)

中国工人阶级从此在世界革命的场合中，作了一员能征惯战的战将，并且在一九二五年“五一”全国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不难了解，自抗战以来，国际工人阶级、被压迫民

族及一切主持正义人士反对日寇侵略的同情运动，不断地在各国发展着，膨胀着，假若没有国际主义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之先锋的、支柱的、指导的作用，那末，国际上决不能引起这样普遍地、持久地、有信心地援助中国的运动。因此，我们估计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时，不仅要足够的估计到中国工人阶级本身的作用与力量，不仅要足够的估计到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许许多多的游击队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劳动人民中的有形的与无形的力量，而且要估计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就是说：日本、朝鲜、台湾等敌人内部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的力量，美国、英国、德国、意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力量，印度、安南、巴西等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力量，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成，现在已在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苏联的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力量，这些力量，都是国际主义的力量，这都是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力量。所以，谁要是轻视中国工人阶级，谁就是不懂得工人阶级的真实力量与作用，谁就是不懂得国际主义者的伟大和坚强不可战胜的力量。

因此，我们纪念“二七”，就要坚决地做一个彻底的民族革命家，同时也要做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我们不做民族改良主义者，狭义的国家主义者。

“二七”的意义与经验教训，依据我所了解的就是如此，是否有当，望读者指教。

注：

- ①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期。
- ② 曹吴，即曹锟、吴佩孚。
- ③ 〈京汉铁路总工会宣言〉（〈向导〉第一百〇三期，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 ④ 〈中共中央祝贺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
- ⑤ 密查员，是由李大钊同志利用合法斗争手段建立的。一九二二年直奉战

争后，吴佩孚为了收买人心，提出了“保护劳工”的口号，企图用工人的力量打击交通系的势力。李大钊同志乃向吴佩孚的御用内阁交通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名密查员。得其允许后，便由李大钊推荐六名中共党员，分别担任了京奉、京绥、京汉、津浦、正太、陇海等北方六条主要铁路的密查员。这些同志利用密查员的身份，在铁路工人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开展斗争，同时对把持各路实权；为工人所痛恨的交通系人员进行揭发剪除，有效地推动了北方各大铁路职工运动的发展。据了解，曾担任过密查员的共产党员有，安体成、何孟雄、包惠僧、张昆弟、陈为人、吴雨铭等。

对女工运动的一点意见

(一九四〇年三月)

吸收群众参加政治生活而不把妇女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是不行的。因为占人类半数的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着双重的压迫。

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①

一

如果说：中国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资本家的三层压迫的话，则中国妇女、女工与农妇就要受四层压迫，即还要受宗法社会的传统礼教、“家庭的奴役”的束缚与压迫。因此，中国妇女、女工与农妇，要争取自己的彻底解放，就必须与中国工人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上，作坚决的斗争，首先就要实行民族民主的革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我们工人阶级，是最受剥削、最受压迫的阶级，我们要解放我们自己，同时要解放全人类。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就要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②。要完成这一极大的政治任务与组织任务，就必须吸收占人类半数以上受压迫最厉害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事业。推动社会前进的事业，改造社会的事业，更需要吸收她们亲身参加这些革命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够说：吸收广大的群众参加了政治运动。每次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深入的试金石，是以妇女是否积极与普遍的参加为断。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

证明了这一真理，现在的抗战过程中，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动员群众中，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二

女工：是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国妇女运动中一支主力军。根据民国十九年工商部举行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等九省之二十九城市的实业工人数目调查，其总数为一百二十万四千三百一十七人，内计男工三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六人，女工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童工五万五千六百零五人，性别年龄不清之工人四十万零一千九百六十九人，如依已分性别、年龄之男女童工计，则男工为百分之四十六点四，女工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七，童工为百分之六点九。^③又如《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实业部编）所载上海、天津等二十三省（市）工业劳动者的人数，为二百万零二百五十六人。内计：男工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九人，女工四十二万一千八百零五人，童工六万一千八百三十一人，性别不明之工人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九百六十一人。就已经知道性别、年龄的人数计算，女工与童工已占全数四分之一。^④再如上海市产业工人人数，据二十二年沪市社会局调查之工人名册，加以分析统计，则共有工人二十三万四千零七十人。其中，男工九万七千八百七十五人，女工一十二万零八百三十六人，童工七千四百九十七人，学徒七千八百六十二人，分配于二十门业，九百八十五工厂之中，^⑤女工人数约较男工多三分之一，多半从事于纺织业。工业愈发达，交通愈便利的城市，女工、童工之数量则愈大。根据以上的三种统计，便知女工运动在职工运动、妇女运动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至于工资，则不但说不上对女工的保护与优待，就是“同工同酬”的原则，即同样的工作，得同样的工资的原则，亦相差甚远。根据民国十九年工商部调查二十九城市每月平均工资统计：上海男工每月平均工资为一十五元二角八，女工则为一十二元五角；宁波

男工每月平均工资为二十四元，女工则为九元；南通男工每月平均工资为二十三元一角，女工则为一十三元四角七。^⑥这就足以说明各地男、女工资相差的程度。

再就各业工人工资说吧，根据《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记载，那就不是“同工同酬”，而是同工异酬，甚至异酬得岂有此理！就最适于女工工作的手工工业说：如制鞋一项，男工最高工资为二十四元，女工最高工资则为六元；又如制帽一项，男工最高工资为二十八元，女工则为八元；再就女工最多的用原动力的纺织业说：如纺纱一项，男工最高工资为四十五元，女工则为二十五元；又如针织一项，男工最高工资为二十四元，女工则为十八元；至于其他各部门，无一不是女工的工资，较男工为少。^⑦

若要说到工作时间的話，则最普通的是“六进六出”（即日班工人从早晨六时进厂到下午六时出厂；夜班工人从下午六时进厂到次日早晨六时出厂），无论是日班夜班，都是要硬站着做十二小时的工，至于长日班的棉织厂、丝织厂，只要它的销路好，厂方要做十六点便是十六点，要做十八点就是十八点，工人的死活，厂方是照例不管的。男、女工的工作时间，大半是相同的，即有差别，亦极微小。

至于女工的特殊要求，如月经期间的休息，产前产后的例假，不独不能获得工资，并且常常借此而开除，受到失业的威胁。工厂法上所规定的“女工分娩前后应停止工作，共八星期，工资照给。”^⑧是白纸上的黑字，而是不兑现的。

抗战以来，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敌人的残害与灾难，比任何阶层为重，女工所受的侮辱与痛苦，则更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特别是在日厂做工的女工生活。在另一方面，敌人为了“以战养战”的策略的实现，对女工的收集，更为积极，对女工的威逼利诱，则更为奸巧，更为恶毒。

根据以上的许多事实，女工所处的状况，对职工运动者、妇女运动者提出了更迫切而严重的任务。

三

现在对于妇女及女工，是并存着两种不同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妇女回到家庭去”。这个口号，是德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希特勒提出来的，可是因为战争，又实在与他自己原来的主张相违反着；在德国是有一千九百万妇女要被拉出来执行强迫劳动。英、法、日、意等国，均将走上这一道路，并且正在走着这一道路；但这并不是他们路线的改变，而是临时的打救命的兴奋剂。我们大中华民国到底有些不同，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一方面大开其支票，允许女工、职业妇女产前产后共休息八星期，入厂工作六个月以上者假期内工资照给（见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布的《修正工厂法》）。另一方面，对女工则毫不实行，且不准议，致发生许多惨剧。对职业妇女，则是交通部新近规定，“凡服务交通机关之女职员，一经结婚，即须停止职务，……”。^⑨要结婚，就要宣告失业，邮政总局则已毫无保留地实行了；乱端已开，职业妇女不独没有得着实惠，相反的，是得着了失业的威胁；这样执行“妇女回到家庭去”的口号，不可谓不巧妙；然而它将受到妇女界的反对，特别是职业界妇女与女工的反对。

第二条路线，就是：应该使每个厨妇都会管理国家。妇女不应该为狭隘的家庭所束缚，应有离开家庭到社会活动之自由。妇女占人类的半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受双重压迫的。妇女、女工与农妇，除了必须与工人阶级及进步人士站在一条路线上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外，还要为女性的特殊利益而斗争。要解除与男子不平等的法律，以改善现在非人的地位，这对私有制度的国家，有头等的现实意义，因而也就是主要的任务。至于把“细小的、个体的家务工作转变为大规模的公共经济，使妇女摆脱‘家庭的奴役’。”^⑩则是私有制度已经废除了的国家的妇女的中心的最主要的任务。

“工人的解放应当是自己的事情，同样，劳动妇女的解放也应当是劳动妇女自己的事情”。^⑪这是列宁的指示，是女工运动、妇女运

动的方针。

这条路线，在苏联是充分地被执行了。苏联的妇女，是过着快乐而幸福的生活，享受着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文化地位上的真正的自由平等。职业妇女是受到各种保障的，生孩子的前后，可以得到两个月的休息，工资照给；子女多的母亲，还可以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津贴等等。陕甘宁边区的妇女与华北的妇女亦正沿着这条路线前进。这条路线，将为全世界的妇女，特别是女工和农妇所拥护，并为其实实现而斗争到底！

四

我们中国女工在罢工运动中、大革命的过程中、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及抗日战争中，都同男工一道，同先进人士一样，曾起过伟大的作用。使资本家、帝国主义者感觉着：中国女工并不软弱，并不易欺。相反的，在假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伪装之下，对战斗的新女性，终究不及对付男工的那样“痛快”。在今天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即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为了实施宪政，我们中国女工是要同男工、同妇女、同农民、同一切先进的人士站在一条战线上斗争。除了一般的共同要求之外，我想女工应实现下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要求在法律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实际上的平等权利；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要求实行宪政，女工应有选派自己代表之权。

（二）切实执行修正工厂法。特别是：

1. 男女工人十四岁至十六岁为童工，只准做轻便工作。
 2.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原则，女工不得在午后十时至翌晨六时之时间内工作。
 3. 女工之工作效能与男工相等，则工资亦相等。
 4. 分娩前后，应停止工作共八星期，工资照给。
- （三）反对轻视女工，侮辱女工的行为。

我们“认为这方面群众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吸引女工的广大阶层加入工会，吸引一切劳动妇女加入合作社和加入工人阶级的其他一般的组织，并使她们积极参加这些组织工作。为了使这个任务容易执行起见，就应当要求职工会经过特别的全权代表或者经过妇女委员会（且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来组织妇女工作，并按期召集妇女——工会会员——的大会，以便讨论一切与她们有关系的工会问题和女工的特殊要求，尤其是在罢工的时候”。⑩

“工会必须注意依照英美的榜样，把工人——工会会员——的妻子组织在辅助团体之内，并在她们中间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⑪

以上是共产国际对职工会中女工工作的指示，是我们职工运动者的行动方针，所以把它引来当做结论。

注：

- ①、⑩ 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一百五十三页，第一百五十四页。
- ② 毛泽东：《〈中国工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横排袖珍本第六百八十五页。
- ③、⑥、⑦ 社会调查所编：《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一日出版，上册，第二——三页，第二十九页；下册，第五页。
- ④、⑤、⑧ 实业部编：《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第五页，第七页，第一百〇三页。
- ⑨ 见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社论：《保障职业妇女问题》。
- ⑪ 列宁：《论女工运动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十五——二十六页。
- ⑫、⑬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目前国际妇女运动的决议》（一九三七年七月），（《解放》一九三九年三月第六十六期）。

工人与宪政的三个故事^{*}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各位同志们！各位工友们！

今天许多的话都被我们的领袖讲完了。大家还要我讲，我讲些什么呢？

我讲几个故事吧！

第一，先讲“法统重光”的故事。民国十一年夏天，那时南北都发生战争。南方孙陈战争，孙中山被陈炯明逐出广东，南方的“护法”政府被取消。北方的直奉战争，直系得胜。直系军阀曹锟想做总统，他自己不好说，由吴佩孚导演，以“恢复法统”相号召，欢迎在南方的国会议员重回北京，“恢复国会”，制定宪法，即所谓“法统重光”的滑稽剧。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工人说：恢复国会好，制定宪法好，要“保护劳工”更好，可是请你们拿实际的行动给我们看吧！我们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提出了十九条劳动法大纲，全国各地各业的工人，均热烈地拥护，开大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形成一个广泛的劳动立法运动，要求国会完全纳入宪法中，并举行议员及新闻记者招待会，指出他们的宪法不是保护

-
- 这是张浩同志在延安工人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当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进行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为了揭露蒋介石的这种欺骗，将宪政宣传夺取过来，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一九四〇年二月，毛泽东、吴玉章、张浩等发起组织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同年三月，张浩与邓发等又发起组织了延安工人宪政促进会。

我们的，是害我们的。工人说这个宪法不好，我们要劳动法大纲十九条。说了许多道理，说的议员无话可说，在民主的假面具下，不得不向我们道歉，以后曹锟实行贿选，以五千银元一票收买国会议员，使得猪仔议员的丑态百出。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被“二七”的血冲掉了。曹锟贿选总统，也自食其果地坍台了。我们的十九条纲领，则已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变为当时罢工斗争高潮中的斗争纲领。

第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故事。民国十四年，我们民众在国共两党领导之下，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于是，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到处都开起会来了。段祺瑞为了掩人耳目，邀请孙中山北上，同时又召集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相对抗。我们在三月也召开了一个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到了二十多省区的代表，代表全国一百二十几个国民会议促成会，开了一个多月的会议，议了国内、国际、财政、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等四个提案，共包括二十几个问题。

当时对宪政问题有两段名言：

“中国国家的权力，现在不在国民手中，而在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使者——军阀手中；一切不平等条约，即是保障此等权力的明文。所以吾中国民众，应集中其精力以求于最近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目前中国国民所要求于此国民会议的职责，不在制定一部空文无力的宪法，而在成立一个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斗的人民机关。”

这是国际问题决议案中评宪法问题的一段。在国内问题决议案里，也有同样的说明：

“宪法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国国民保持主权的一部证书。这部证书，必须国民自己得了政权以后，才能产生出来。向统治的军阀要宪法；与奴隶要求主人严定管理法一样，结果反让统治阶级强奸民意，任意造作。政权的取得是由于革命的力量；必须国民革命成功，才有国民自己的宪法可言。……真正的国民会议之目的，就

是要求政权收归人民以解决一切外患与内忧。”①

后来国民大会没有开成功，但民众可起来了，北伐就胜利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促出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

第三，便是民国二十年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的故事。这是某要人②一时心血来潮，想挽救当时天怒人怨的局面，于民国十九年十月拍发江电③提议召集国民会议。我们工人及全国民众实际上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虽然当时陡然地多了一些工会招牌，工人们并不知是一个什么事。“五五”宪法④公布快十年了，我们的政治自由就在那个“刀笔吏”的“非依法律”四个字下被剥夺干尽。他们所谓的法律不是国民会议议出的法律，而是个人的政府、党部泡制出的个人的私见、命令，他们没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精神，而是相反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关于工人的四个官样文章的决议案，如救济失业工人案，颁布特种工会法案，彻底修改工会法及工厂法案，全国及各省市县工会之组织案等，现在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总之我们是一无所获，相反的，自国共分家大革命惨败后，我们没有权建立全国全省的总工会，这就等于我们的头被砍掉了。全国邮务总工会直到现在仍是非法的。为全国工人所希望的工人抗敌总会，虽然代表都到武汉集齐了，也不能开成大会，至今说起来，还觉得心痛。

自国共分家大革命失败后，店员工人不能加入工会。五十人以下的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工人，均没有组织工会的法律保障，这就等于我们的手足被砍掉了。同一个公司下的各厂工人不能组织一个产业工会，我们的肢体是被分裂了。这样就不能不影响我们工人在抗战建国中应起的更大作用。那次没有努力的去促一下，是吃了一个大亏，被人家套上了一个黄锁链，锁了近十年。

以上三个故事，只说明一个问题，即关于我们自己命运的问题，就必须由我们自己的斗争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这是历史的教训。现在即已提出了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则我们一定要参加，力争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更有促进必要，虽

然不容易，但却大有希望，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是不会错的。虽然这次不一定促得出一个漂亮的宪政并实际地执行起来，但可能促出一个有力量的东西来，即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来，将由它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同志们努力吧！

注：

- ① 见《向导》第一一三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出版）
- ② 某要人，指蒋介石。
- ③ 江电，指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在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将要结束时，从战地开封发往南京的一封电报。根据蒋介石在这封电报里的提议，国民党当局于1931年5月5日召开了所谓的“国民会议”，通过了一部以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由于3日的代日韵目为“江”，故称“江电”。
- ④ 五五宪法，即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由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宪法草案”。全文共八章，一百四十八条。中心内容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站在抗战最前线的华北工人^{*}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

“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去保证工人、劳动农民和少数民族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同时要站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最前线，并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不让‘自家的’资产阶级用出卖本国利益的方法，去与侵略的强国妥协分脏”。^①

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对被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斗争和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所指出的任务。我们在抗战进行将近三年的“五一”节的时候，根据这一指示，检查一下站在中国抗战最前线的华北工人，在抗战以来的作用，我想是有必要的，但要在这篇短文内说到一切是不可能的，现只将华北工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及其作用加以叙述，但因材料的不充分，尚有很多遗漏的地方，尚希读者原谅与补充。

一、抗战开始时的作用

1. 七七炮声刚响，平津尚未陷落时，平汉长辛店工人经我党及大厂民先队^②工人的推动，以艺徒同学会为基础，马上就组成战地服务团，它首先在全国人民面前，举起了参战的旗帜，担当起芦沟桥战地的救护工作，给予二十九军的英勇战士以极大的帮助与鼓励。此后二十九军退出该战线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破路队的中心力量。

• 这是张浩同志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写的文章。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新中华报》。

2. 北宁路廊房工人给当时对于抗战还在徘徊不定的驻防军官以坚决抗战的推动。这些军官在他的长官严令不准对日作战及作战必然腹背受敌的欺骗下，陷于极端狼狈的境遇。当时工人领袖代表数百工友向他们请愿，详细分析了政治形势与战争前途，说服了他们悲观失望的情绪，打击了投降论调，揭破汉奸卖国贼的阴谋；同时鼓动下级士兵向长官请缨作战，进行自下而上的督促。在这上下工作配合中，在日寇节节进逼之下，他们终于接受工人代表的意见走上战场。此即廊房工人推动抗战的决定作用。战争开始我们即以工人自己可能的力量给予战斗以配合，当敌军列车开向廊房的时候，司机司炉工友即乘机弃车；而在激战的时候则破坏杨村大桥及路轨十余里，阻止寇车的增援，迟至十余日才能通车。这在武装保卫平津的任务上，起了伟大的作用。

二、华北工人的武装抗战

华北工人武装抗战的发展是随着敌人向我进攻的时间与方向发展起来的，如敌人进占正太路的娘子关时，正太路工人、阳泉煤矿工人不是随着正太路管理局的大人先生逃难，更不是象保晋公司的资本家们很驯服地做亡国奴，而是拿起枪来在正太路沿线打游击，经常袭击敌人，破坏铁路，起了疲惫敌人、消耗敌人、拖住敌人的伟大作用。同样的，敌人进占太原时，太原的工人，便立即在交城、文水、汾阳一带，榆次、太谷、祁县的工人游击队，便在同蒲路东一带，与敌人周旋着，把敌人拖住，使得八路军便于建立晋东南太行山的抗日根据地。敌人占领临汾时，同蒲路的铁工自卫队便在该路东南袭扰敌人，组织群众团体。再如青岛纱厂工人的劳山支队，淄益博矿工武装队等等，莫不是象“跳蚤”一样地袭扰敌人，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华北工人游击队就有二十六个之多，至于唐山工人的武装起义，则更为华北工人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兹就已有材料的部分，分述如下：

1. 唐山七千矿工的武装起义的英勇行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沦陷区的主要城市及工业区域用武装起义配合抗日军队，驱逐日寇

出中国的先声，兹将其经过简略叙述如下：

（1）起义的原因与准备：

唐山五矿工人在保卫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基础上，运用了日寇准备接收或投资开滦煤矿，倾销抚顺煤的英日冲突，包工的大柜与矿主的冲突，矿主与赵各庄商人公卖上的冲突，在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与推动之下曾经举行了三万余人的大罢工。反对日寇勾结矿主破坏开滦煤矿，保卫产业、保卫工人生活。坚持一个多月，发生数次武装冲突，双方死伤二百余人，分粮分煤成立工会，夺取矿警的武器武装自己，英国派兵到秦皇岛，认为系日寇指使，提出严重抗议，日寇从中假作调停，工人把日本的调停人打了，形势极为严重，这就是反日起义的前夜。

八路军宋邓冀东挺进纵队^③于六月二日跨过了平绥路，进入热河边境，不断地打击敌人，收复昌平、兴隆，平谷、宝坻、蓟县等县后，掀动了冀东的抗日怒潮。七月九日，冀东民众武装及反正的原有武装同胞，在洪素兰^④、李运昌^⑤、高志远^⑥等志士领导之下，在昌黎、滦县、乐亭、迁安、遵化、丰润等县共同起义，当即与宋邓纵队会合，成立了抗日联军，并于数日之内，攻克乐亭，袭入滦县、昌黎及唐山市郊等地，切断北宁路，炸毁敌伪的矿山、油库，一时声势大震，地方伪政权中的汉奸相随鼠窜。赵各庄、林西、唐庄子是在乐亭、滦县、迁安、丰润、唐山的中间，也就是说在八路军挺进纵队及武装起义的群众包围中间，日寇在当地的统治，完全动摇了。

（2）武装起义的经过：

赵各庄、林西、唐庄子的矿工组织最强，斗争经验最丰富，政治觉悟程度较高，特别是党的工作有基础，在群众中有很高信仰。他们为了用武装起义响应抗日军队参加武装抗日战争，曾与厂方进行诚挚的谈判，得到各方面甚至国际友人的精神上的同情，并得到他们之间给与的便利与援助，那真是极尽沉痛伟大的场面。当七月十八日七千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在他们的队伍中，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民先队员、有无党无派热血沸腾的广大工人群众，

同时还有矿厂职员，还有外籍友人。起义后他们与敌伪军作了两次激烈的战斗，其中一些勇敢的领袖壮烈牺牲，但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同抗日联军汇合在一起了。这是持久抗战中工人阶级在敌后举行武装起义的模范。当抗日军队接近某一城市或工业区时，该地工人群众领导民众以武装起义的方式，直接配合作战，这是全党及整个工人阶级及一切先进分子均应充分研究与学习的。在持久抗战的第三阶段时，敌后起义的配合将愈显示伟大的威力。

2. 六河沟煤矿工人的武装斗争，首先在华北建立第一个民主抗日的县政权。当敌人于一九三七年冬进占磁县时，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独立地埋头苦干了多年的六河沟的工会干部，即组成第三、第四两游击支队，进行了无数次地英勇战斗。特别是马头关的战斗，运用了游击战术，使敌人互相对打起来。

敌占磁县，县长即逃跑，该县工会干部领导民众在彭城成立民主的县政权，选举县长，领导民众抗战，实行抗战动员，为华北最先成立的民主政权。中间虽经过各种困难，但均被克服，坚持到现在。

磁县机器工人在田珍同志^⑦及其侄田蕴华同志^⑧领导与推动下，把该厂可搬走的机器、原料及配备齐全的设备和各种修理与制造枪支弹药的技术工人等，均带到抗日根据地来，帮助八路军一二九师成立了一个轻便的兵工厂。这一个小小的行动，据说在苏联工人中已成为流行的关于中国工人在抗战中的佳话。

3. 平汉路北段的铁路工人，在张树荣同志^⑨领导之下，成立平汉铁路工人游击队。当前年在徐州时，他们只有二十多个赤手空拳不愿在敌人统治下做工的铁路工人。他们开始时，常破坏铁路以致火车经常地出轨。造成敌人运输极大的不便，随着边区抗战的日益展开，他们也一天一天地壮大了，他们数量增加到几百人，这时他们分成四个小队，配合军队作战，在粉碎敌人对边区围攻的斗争里，他们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那时从清风店到望都的铁路，他们连续破坏了六七次，有一次仅仅是十个工人，就把从方顺桥到保定

的火车头破坏了两个。他们从成立到目前这个时期总计破坏了铁路数百次，毁火车头十三个，火车出轨三十次，获道钉万余及电线数万丈。至于其他的胜利品，就多得无法统计了。

4. 阳泉矿工、正太铁工、榆次纱厂工人等三个游击队，联合组成榆太游击支队，建立了许多的战绩。曾因捉火车头的故事，取得了农民及八路军的高度赞扬。他们经常配合主力军作战，并在正太路与同浦路衔接地带，经常独立作战。他们采取了惊扰的办法，时常放冷枪，骚扰敌人，更善于发扬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使敌人不得不向他们做防御工事。

5. 同浦铁路铁工自卫队不仅进行了有名的锄奸护路运动，曾获得了阎司令长官奖给的“锄奸先锋”的锦旗。特别是经常在晋东南与敌人作战，转战于中条山及芮城一带，他们曾经把芮城收复，王三友同志^⑩就是这次战役中牺牲的。他们曾经在翼城、沁水一带配合中央军十四师作战，破坏了许多铁路。在战斗胜利后，十四师曾补充了他们不少枪支子弹，并写信赞扬铁工队英勇斗争的精神。他们经常破坏铁路，使敌人的火车经常出轨。他们曾经以七个队员，击退敌人十三辆运输汽车。在夏县北史村的战斗中，曾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更在翼城、曲沃、新绛、沁县等地，进行了除奸等工作。我们更不能忘记：他们是从无衣无食，在极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6. 太原工人自卫队开始成立时，不过二十几个人，枪支不全，以后发展到七八百人，现在已扩大到三个团，武装也较为充足。他们虽然都是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但在不断与敌人武装搏斗的环境中，已锻炼成铁一般的队伍。他们在太原敌人胸口的交城、文水、汾阳等地区，从开始到现在，已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役百余次。他们始终站在前进的岗位上，使敌人不能获得一个顺畅的“呼吸”。

7. 山东淄益博矿工武装队，曾炸毁敌人的博山总电厂，烧毁淄川洪山煤矿，给日寇以很大的打击，单资本一项就损失百余万

元。武装队经常袭击铁路，打击汉奸，我主力移动后，伪组织也不能建立起来。

从这些个别的简略的例子，不难看出华北二十几个产业工人游击队在抗战中的英勇姿态。他们现在有的已经成为正规军，有的则继续与敌作战。

三、动员参战工作

1. 工人自卫队与游击“小组”在华北凡属有工人组织的县份及工厂里，普遍建立了游击小组，它是不脱离生产的，在名义上它虽然叫做游击“小组”，可是参加的人数，则是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的。它经常破坏敌人的交通，袭击敌人的辎重、运输，截获它的辎重等等。兹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些游击“小组”在目前的作用及其前途：

灵山矿山模范自卫队，有五百八十人，他们以英勇的姿态迎击和粉碎敌人每一次“扫荡”，他们动员了人力物力财力，帮助抗日的政府及军队，坚持敌后的残酷战斗。根据六个月的不完全统计，仅“河身里”分会就发动过三百人，大规模地破坏交通就有十次，并动员了四十多副担架去抬伤兵；“下坡下”的工会破坏交通二十八次，动员了九百多人，抬了三次伤兵，共有一百八十六人参加。总共破坏交通六十六次，动员了总人数三万二千零四十人，担架运输共九百三十人。他们在部队战斗的前后，还进行慰劳工作，在半年里，曾经慰劳面粉一千斤、猪七口、羊四只、饭七担、菜三担、更捐洋九十元。在这个时间内他们还还为部队募集了子弹五百二十三粒、弹壳四千一百三十一一个、手榴弹十九个、冲锋枪子弹十粒、刺刀一把。同时他们还组织了侦察、送信、游击等小组。经常去配合战斗，报告消息等等。“下坡下”的工人夜里引着某团去夜袭党城的敌人。十几个工友在庞洼的战斗中，经常在火线上运送子弹，救护伤兵，并同部队一道冲锋，以坚决勇敢的精神，帮助军队打了胜仗。

唐县游击小组从反攻胜利到去年六月共缴电线六七千丈，他们

常常发动四五百人至七八百人，破坏敌人的汽车路与有防御工事的要塞。有一次在一个黑夜里，工会干部率领一群工人，到平汉路上破坏铁道与截击敌人的电线，适遇“爱护村”清道夫与几个日本兵提着灯走来，这一群工人不慌不忙非常沉着的，用铁钳剪着电线，发出搬枪机似的响声，对面的敌人，恐惧的以为遇到游击队了。因之，当工人们要他们将灯熄灭并叫他们回去时，他们恭顺地听从了。后来，这一群工人破坏了铁道与截取了电线安然而返。从这个例子，你会看出我们边区工人对于斗争的生活，是有怎样的丰富经验。他们已有足够的力量与方法，来应付敌人与造成敌人的困难。

2. 动员工人参加军队

在抗战过程中，特别是抗战的初期，不仅是雇农工人，手工业工人积极地参加军队，产业工人参加军队的就更加勇跃。兹就不完全统计，有组织的加入抗日军队的就有××，×××人^①，有许多动员得相当的好，例如：

磁县在党的模范工会干部领导之下，它不独能够适应客观需要自动的成立游击队，建立抗日民主的县政权，并积极动员工人参加八路军。当一二九师从辽县派一个小的支队到磁县时，磁县及六合沟的工人，爆发了一个参加八路军的热潮，在很短一个时期内（约半个月）便有三千以上的产业工人加入八路军，其中发生许多弟兄朋友相约而来加入八路军打鬼子的佳话。

同浦路工人全数不过八千到一万，他们有组织地参加武装斗争及进行抗日工作的就有二千人以上，他们遍布在新军、中央军、八路军之中。在各抗日学校学习的，就有四百人以上。同浦路总工会，虽然正式成立只有几个月的短时期，可是它在抗战动员工作上，则起了极伟大的作用。这就可以说明工人组织的重要了。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真是举不胜举了。至于城乡手工业工人及雇农工人自动加入抗日军队的，因为他们组织的薄弱，尚无统计，同时在抗战初期参战的热潮中无法统计。不过在华北有一千万左右的手工业工人、渔业工人与雇农工人，在他们贫困的地位上看

来，其参加军队的数量，当然是很大的，并且还是继续不断的有组织的补充抗日军队的源泉。

四、华北工人是站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最前线

根据以上部分的事实，便足够证明华北工人已经是站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最前线，它同华北一切抗日的民众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共同奋斗。更配合共产党八路军创造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因为抗日民主政权政治上的开明，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农民及其他抗日民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更因为华北工人及其政党——共产党与八路军要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原故，大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信心，打击了汪派、汉奸投降妥协的企图。

当目前德日意帝国主义在企图扩大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正在加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时，当全世界无产阶级循着列宁斯大林的道路前进时，中国工人及被压迫的民众，是其中的一个战斗的组成部分。我们将在反帝国主义战争与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中团结起来，战胜共同的敌人。“五一”便是我们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旗帜，我们要用战斗的精神，把它高高地举起：“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

注：

- ① 《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与共产国际的任务——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根据爱尔科里同志报告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
- ② 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它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青年团体。一九三六年二月在北平成立。
- ③ 宋邓冀东挺进纵队，是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于一九三八年六月由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宋时轮支队（十二支队）与一一五师的邓华支队（六支队）在平西合编而成，又称八路军第四纵队。随后，深入冀东，配合冀东人民的抗日大起义。

- ④ 洪素兰，即洪麟阁，爱国知识分子，国民党员。一九三八年七月毁家纾难，在丰润县起义，任冀东起义军总司令，后由冀东向平西的转移途中，英勇牺牲。
- ⑤ 李运昌，在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前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起义中负责军事工作。并任冀东起义军副总司令。
- ⑥ 高志远，原系民团头子，当时在共产党员王仲华的推动与帮助下，在滦县起义。起义后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后因通敌叛国，被革命军事法庭公审处决。
- ⑦ 田珍（1903—1939），河北房山琉璃河人。十五岁到磁县矿场学徒，后到平汉路、正太路做工。正太路工会恢复后，连任工会理事。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失陷后，建立铁路工人游击队，配合矿工自卫队和主力军牵制敌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任一二九师兵工厂政委，一九三九年五月病故于辽县。
- ⑧ 田蕴华（1914—1976）北京良乡人，正太路铁路工厂工人，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随田珍赴太行建立兵工厂。解放后任铁道部天津机械配件厂副厂长。
- ⑨ 张树荣，又名张根成（1893—1977）河北博野人。铁路工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二七”大罢工等工人运动。芦沟桥事变后，任八路军游击队长、平汉路北段破坏大队长和晋察冀边区铁路总工会主任等职。解放后任天津公安分处和太原铁路局车辆处副处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 ⑩ 王友三，同蒲路工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侵占同蒲路中段时，参加武装抗战。同年十二月五日同蒲路总工会组织工人自卫队时，担任队长，率领自卫队在晋南积极开展除奸斗争，先后捉拿大汉奸张玉祥等四十二名，曾获得第二战区“锄奸先锋”的奖旗。一九三八年一月，在配合农民自卫队收复芮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 ⑪ 据有关资料记载：到一九四〇年，参加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工人有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人，另有其他团体动员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工人有二千六百六十八人。

祝贺朱宝庭同志六十大寿的信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宝庭同志：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都说过：“要替你做寿”。在延安和前方的许多工作人员、工人、学生也准备向你祝寿，现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就代表了大家的意志，替你做六十大寿。我以为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中的一件大事，证明中国工人已开始能够掌握自己命运和变换自己命运的一件大事！

我病在床上时常设想到：一个在资本主义、军阀、官僚剥削压迫制度下的老工人——一个六十岁的老工人，无儿、无女，无分文的积蓄（不可能有积蓄），口里只有三、四个无力的牙齿，上唇则是盖不住牙的缺咀，手指头只剩下七个，眼睛则是半瞎，突然被工厂或轮船上的主人象一只“破草鞋”赶出来，怎么办呢？这种凄惨的遭遇和痛苦是无法形容的！真是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其结果，是同一般的老工人一样——白天是在十字街头：“老爷啊大人！给我几个铜元，救我一条狗命！”晚上或者睡在弄堂，或者睡在破庙，等候着死的到来。然后被存心善堂收尸的工人用一条破席或四块薄木板包起来埋掉，就这样结束了一生！这决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必然的规律。许多的工人，特别是中年以上的工人，谁不为这一结局恐怖着！

-
- 这是张浩同志在病床上写给老海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朱宝庭同志的祝寿信。原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出版的《中国工人》第十二期。

做工！做工！日夜手不停。年轻顾不着嘴与身，年老活遭瘟。
若是失了业，更教你：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哎！这个锁链，何时得松？

敬爱的宝庭同志！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工人。然而你竟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了绝对相反的结果。全国的工人，特别是海员工人，对你是信仰与爱护的。延安是你的家，无论是厂长与工人，教员与学生，见着你就围绕起来，要你讲你自己的故事，讲革命的道理，有时候，还要你唱一个歌，每个人从内心里感觉到你不独可敬，更觉得可爱，比自己的父母祖父更可爱。大家都说：朱老到处都有儿子女儿，或者孙儿孙女。到底有多少呢？则谁也算不清楚。在星期天总是应接不暇。生活起居，则是享受延安头等的待遇，外加保健委员会的照顾：牙齿用金子镶起来了，不仅有“水皮袄”（有酒吃），而且有火皮袄，日常专有“小鬼”侍候，开会看剧坐在最前列。你这种愉快而幸福的生活，开辟了中国工人待遇的新纪元，不仅使全国工人羡慕，更吸引全国工人及劳苦大众向着你的道路前进！

你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呢？我想是由于你打破了“安分守己”不相信“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忠实于阶级，忠实于民族，忠实于自己的党，只知革命的利益，大家的利益，不顾自己的一时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你胜利的原因。但“干到底”的精神，则更是你胜利的主要关键。革命高潮时你是干！低落时更干！当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历届委员时，你是努力地干！当你坐牢，讨饭时，仍是顽强地干！大家拥护你时，你干！在个别问题、个别时候怀疑你时，你仍然是干！不为威逼，不受利诱，站稳了阶级的立场，以苏联为灯塔，你唯一的信心：就是“干到底”！

鲁迅先生曾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①是的，你就是非跑至终点不止的一个；虽然你不是在最前面，甚至也不是在前

面，而是跟着跑。这在“英雄豪杰”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回头一看，从“二七”到现在，剩下的工人干部还有几个？就是从大革命干到现在的又还剩下多少？其中固然有的光荣牺牲了，但有不少是消极干不到底！或者是跑得太快，跑到泥坑里去了。如不可一世的陈独秀、彭述之^②、张国焘、罗章龙^③、余飞^④等人，至于象玩笑且汪精卫一派的东西，则更不要说了。由此可见，不管跑在前面或跑在后面，只要能跑到底、干到底，便难能而可贵了！我们工人本是平平常常的人，现在知道做自己应做的平平常常的事，用群众的力量干到底，这必然会得着胜利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与精神就在于此，共产党的力量与精神也就在于此！

宝庭同志！你是中国工人前辈的代表，是有正义感、有觉悟的正派工人的典型。你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你的努力，你的奋斗是适当的，因而也就是胜利的。将有千百万工人沿着你的道路跑到底，干到底！他们将掌握着科学理论的武器，充分利用长期斗争的经验，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更有力的前进！

在你做寿的时候，我送你一件珍贵的礼物——一件皮大衣。它的珍贵，并不是因为它的毛是直的，它的名字叫做“狐”；相反的，我们过去看着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野兽们穿着，是更增加我们的愤恨。它的珍贵，就在于它是由冀察工人游击队，很正确地执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从一个大汉奸那里“拿来”的，又执行了鲁迅先生的分配办法，把它送到延安来，虽则他们不一定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我本想把它送给我的亲爱的母亲，我想从母亲——群众那里得来的礼物，依然送给母亲是适当的，然而我的老母亲已成为亡家奴了！

你本来就是中国工人的母亲，又正值你的六旬大寿，穿这件衣服，是非常适当的。所以我就代表中国工人，把这件宝贵的礼物送给你，以表示我们对你的敬意！祝你
万寿无疆

你的战友 张 浩

注：

- ① 鲁迅：《这个与那个》，《华盖集》，收入《鲁迅全集》第三卷，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 ② 彭述之（一八九六—— ），湖南宝庆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追随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主义分子，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
- ③ 罗章龙（一八九六—— ），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解放后，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授。现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
- ④ 余飞，又名余茂恒、余茂怀。原是上海机器工人，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委员等职，后叛变。

悼张浩同志

《新华日报》社论

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了二十年的张浩（林仲丹）同志，于本月六日在延安逝世了。

张浩同志是职工运动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正是因为他生长于工人的家庭，锻炼于职工运动之中，他始终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不懈，乃为工人所爱戴拥护。他在艰苦奋斗的一生中，学习和掌握了革命理论，领导了职工运动，遂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最优秀的战士。

张浩同志的一生，表现了对工人阶级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为了革命事业，数度入狱。备受酷刑拷打，始终不屈不挠，再接再厉，没有因为威胁、毒刑和磨难而退却和屈服。相反的，这些惨痛的磨难，更坚强了他的意志。

张浩同志的一生，表现了对法西斯强盗誓不两立的仇恨和消灭侵略者的决心。当他在东三省时，不幸为日寇所捕，日寇畏惧这位领导东北工人和全体同胞与它顽强搏斗的战士，是当然的。落在日寇手中而遭受最残酷的毒刑，也是当然的。然而，这些肉体上的苦痛，绝对挫折不了坚强战士张浩同志的坚强意志！张浩同志对日寇始终英勇不屈，他发扬了我们的民族的光辉传统，树立了中华儿女的楷模，给了日寇残暴统治以最光荣的回答。

抗战开始后，张浩同志曾一度担任过第十八集团军一二九师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他不顾在监狱生活中受过折磨的身体的内伤，仍然英勇地走上前线，坚决的领导一二九师战士与敌人长期搏斗，

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的坚强的特点。

张浩同志的精神，是对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二十年如一日的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他具有每个中国工人、民族战士、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然而，张浩同志终于因日寇的残酷的摧残，受到不治的伤害，成了他致死的基因。张浩同志是残暴的日寇害死的！张浩同志的死，增加了我们对日寇的更深一层的仇恨，我们应以更大的决心，立誓为张浩同志复仇，为民族复仇。

我们要复仇，就得发扬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不动摇，不气馁，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耐得住劳，吃得了苦，不对困难让步，不为威力屈服，能够在长期的苦难中，始终如一，奋斗不懈！

我们要复仇，就得提高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坚决打击日寇。我们决不能因为现在外援的困难而悲观，更不应因为现在经济等等的困难而沮丧。敌人正在加紧其政治攻势，我们只有更加奋勉，咬紧牙关，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我们要复仇，就得认真实行张浩同志对工人的号召，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工人们要认真的团结起来，努力生产，服务抗战。全国工人的团结的铁锤，不怕消灭不了日寇的侵略。

张浩同志死了，我们一定能够以完成民族解放的事业来安慰他，来纪念他于永久！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

延安各界连日吊唁瞻仰 张浩同志遗容

张浩同志定于今日上午九时举行公祭，十一时安葬。

六日至九日中央大礼堂作为张浩同志灵堂，致哀的半旗低垂在礼堂顶檐，灵堂外用蓝白色布帷扎成的牌坊，上面写着“工人先进”“战士楷模”。虽然治丧委员会通知八日开始吊唁，但七日各界同志先期前往者已达五百余人，八日达二千人以上。“忠心为国，虽死犹荣”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挽词，灵堂四壁遍悬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致送之挽联花圈，吊唁的个人与团体代表，脱帽步进灵前，向张浩同志遗体致敬礼，然后登堂瞻仰遗容。棺柩两旁，中央直属各级党的组织，轮流派党员赴灵堂护灵，四位灵丧护卫员肃立灵旁，左臂的红臂章上蒙有黑纱。连日朱总司令、叶参谋长、林彪、陈云、罗迈等同志皆亲往吊唁，附近各工厂工人更是终日不绝，其他如商会代表、回民同胞、文化界诸同志，亦皆纷纷前往吊唁，甚至有人一日数次前往，张浩同志生前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已深深植入广大后进者的心底。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解放日报》）

张浩同志昨日安葬

三月九日，张浩同志的殓期，在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上，充满了肃穆凄切的气氛，万余送葬者，列队肃立在灵台前，花圈挽联，遍悬会场四周。签到处人群拥挤，丧礼登记处堆集着许多花圈挽联。灵台前第一排凳子上，坐着毛主席及中央各位同志。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轮流护灵之后，祭礼开始了。主祭任弼时同志献上花圈。哀乐奏起，哀思缭绕全场。

无数颗悲哀的心

倾洒着满怀的热泪

.....

你的英名是支光亮的火把

照耀着他们前进，

.....

请安息吧！请安息吧！

挽歌像一支悲哀的箭，刺入每个人的心底。李克农同志以悲怆的声调读了祭文。

张浩同志是纺织工人出身，革命二十年，饱尝艰辛。他的历史是纺织工人的光荣，是中国优秀儿女的模范。中央领导同志号召大家向张浩同志学习。第一，学习他对敌人英勇不屈的精神。他生前足迹遍中国，三次负伤两次被捕，在敌人刺刀的前面，不改布尔塞维克的本色。第二，学习他对群众的密切联系，当他在工人中工作时，工人们都称他是“自己的人”。他到处给工人们以信心，使他们不怕一切奋勇向前。第三，学习他在党内正派的作风，他服从组织，爱护同志，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全场多少人在低声咽泣，挥

拭着泪水。老海员工人朱宝庭同志代表中央职工委，谢觉哉同志代表边区政府与边区二百万人民，高长久同志代表边区几万工人相继致词，最后由张浩同志家属致答词，次子林汉南挥泪告诉大家，

“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好好工作，继续爸爸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才对得住党，对得住死去的爸爸……”。祭礼结束，工人、学生、士兵、商人、群众，苍苍的老者与幼小的儿童，送葬者纷纷前往抢执花圈、挽联，一个断腿的残废同志，支着拐杖，抢走几步，拿到一幅挽联后，又默然退回到自己的行列中去。

灵柩装上白布帷的灵车，送葬者迅速结成了漫长的行列，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中央委员亲为执绋。

骑兵队、手枪队、乐队、花圈挽联队，一面鲜艳的党旗后面，是张浩同志的遗像。以后执绋人、灵车、送葬者，万余人的行列，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徐徐向墓地前进。

沿途观众如山，途为之塞，听不到一点歌声、笑语，延安已沉入无声的悲哀中。

抵达山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人们抬着灵柩，爬上山巅，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等同志亲自抬棺而行，徐特立同志亦脱去棉衣，挥汗上前，置杠于肩，苍白的鬓发上闪动着晶莹的汗珠，脱落了牙齿的口中在吃力的喘气，见者深为感动。

队伍齐集山巅，灵柩送入墓穴，哀乐又起，万人恭立墓前，静默致哀，最后行奠土礼，中央诸同志及各界代表奠土入穴，一堆黄土，掩盖了一位革命战士的驱骸，死者光荣的历史与英勇奋斗的精神，将永存人间。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十日《解放日报》）

一二九师、一二〇师指战员 哀悼张浩同志

太行反扫荡激战之时，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闻悉张浩同志病逝噩耗，莫不痛切。为纪念张浩同志，杀敌更为奋勇。现反扫荡战已经结束，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由刘师长领衔，致电中共中央委员会，哀悼张浩同志，原电如下：

延安中共中央委员会：

正当太行区粉碎敌扫荡之时，惊闻张浩同志病逝噩耗，全师莫不同声悼念。张浩同志终身致力革命事业，在援西军政委任内，曾在中央路线之下，领导同志展开反国焠路线之斗争。及七七事变后，又率领一二九师抗战，以及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怀念艰苦忠实的模范，益勉励我军努力于抗战救国之伟业。遥望云天，驰电唁吊。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黄镇、陈再道、宋任穷、王宏坤、刘志坚、陈赓、王新亭、陈锡联、谢富治及全体指战员。

一二〇师全体指战员，闻张浩同志不幸病逝，乃于日前致电张浩同志家属慰问。原电云：

中共中央转张浩同志家属：正值击溃敌寇扫荡之际，惊闻张浩同志逝世，噩耗传来，深感悲悼。张浩同志是世界工人著名领导者，我党优秀干部，一生为民族与社会解放，艰苦奋斗，功劳卓著，因而病故。这不仅是我党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我们除继续其未竟事业，奋勇杀敌外，特电唁吊，并致慰问。

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周士弟及全体指战员。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

晋冀豫职工团体哀悼 张浩同志

中共中央委员、职工运动领袖张浩同志病逝的不幸消息传来，中共晋冀豫区职工委员会，山西省总工会，晋冀豫职工会，特电延安张浩同志治丧委员会吊唁。原文有谓，当我们万分哀悼着张浩同志的死底时候，对张浩同志二十年如一日那样献身革命，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布尔塞维克的革命坚持性，不禁肃然起敬，我们将学习这种革命坚持性，我们将更加坚持胜利的革命斗争，以追悼纪念张浩同志，并向张夫人涂松芝致深切的慰问。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解放日报》）

全总举行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张浩座谈会

本报讯 三月十日下午，全国总工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工人运动卓越的领导人张浩同志逝世四十周年。与会同志缅怀了张浩同志革命的一生，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要很好地学习张浩同志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保持和发扬工人阶级的本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张浩同志原名林育英、林仲丹，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为我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他曾三次身负重伤，两次被捕入狱，受尽敌人酷刑折磨，但始终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坚贞不屈。一九三〇年以后，他先后执行了党的许多重要任务，担任了党、军队和工人运动的领导职务，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座谈会由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我国工人运动的老前辈，张浩同志生前的老战友，他当年主持的职工大队、工人学校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以及张浩同志的夫人涂俊明等共一百一十多人。过去和张浩同志一起工作过的王鹤寿、赵毅敏、曹瑛、吴亮平、李达、郭述申、李颀伯、胡奇才等在会上发了言。

一九三〇年与张浩同志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工人运动的王鹤寿、赵毅敏同志说，张浩同志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一九三〇年满洲省委被破坏，他在沈阳担起了重新组建满洲省委的艰巨任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他

为恢复党的组织，亲自到抚顺煤矿当工人，和工人干在一起，住在一起。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地下党团组织终于很快恢复起来了。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要学习他真正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做好群众工作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张浩同志一起在军队工作的李达、郭述申和胡奇才同志说，张浩同志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任政委期间，善于用高度的原则性和党性教育干部和战士。他一方面引导大家坚决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军队的错误，一方面向干部、战士讲解党的政策，教育干部、战士按红军宗旨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战斗。今天，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中央，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政治品质，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三八年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同张浩同志一起创办职工大队的曹瑛同志说，张浩同志是我们党的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他具有工人阶级的优秀思想品质，对革命同志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并且善于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他在办工人学校时，学员们谁的思想不通了，经他一谈就服服贴贴了，大家都钦佩他有工人的感情，工人的思想，工人的作风。

（原载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一日《工人日报》）

附录二

张 浩 年 谱

张浩年谱

(1897——1942)

熊经浴 李海文

一八九七年(诞生)

2月25日(农历正月二十四日)

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染铺湾一个农村手工业者的家庭，原名林祚培，号毓英(育英)。

一九〇四——一九一四年(七岁——十七岁)

读私塾，有时中断，在家做手工。

一九一五年(十八岁)

在家操作染织，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想靠劳动“成家立业。”

一九一六年(十九岁)

与涂家大湾的贫苦农民涂庆虎之女涂松芝(现名涂俊明)结婚。

一九一九年(二十二岁)

5月下旬

接到在武昌读书的堂弟林育南的信，得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即向聚集的人群宣传了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壮举。

秋

在林育南等进步学生的影响下，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思想。

冬

与林育南、林洛甫在白羊山八斗湾庙创办宣传新思想的浚新小学和通俗讲演社，并将三弟林育农引荐到该校学习。不久因经费困难，中途废辍。

一九二〇年（二十三岁）

春末

到上海隆化公司染厂做工。秋，因长子林泽生（即林肖碇）病重回家。

一九二一年（二十四岁）

2月14日

与恽代英、卢斌、林洛甫商量，恢复浚新小学和创办毛巾厂事宜。后恽代英回武昌邀请互助社成员唐际盛到校任教，浚新小学正式恢复。

春

在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的利群书社支持下，与林洛甫在武昌太平试馆（后迁武昌大堤口）开办利群毛巾厂，并为主要负责人，实行半工半读，进行共同生活的试验。

7月16日——21日

与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四人在浚新小学召开互助社及社外朋友的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确定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会议主张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会上，被推举为工厂的“工作委员”。

会后与林洛甫等应易礼容邀请前往湖南帮助创办长沙望麓园织布厂。

10月24日

父病逝，回黄冈奔丧。

一九二二年（二十五岁）

2月

在武昌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用名林仲丹（仲樵、仲旦）。参加革命后，先后用名：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春山、林春山、李春生、张开照、陈子贞、李福生、李复生、林武、张浩。

春

利用岳父涂庆虎在大冶县城经营土布生意的社会关系为掩护，化名李福生到大冶黄石港、石灰窑、袁家湖地区（即今黄石市）开拓工作，在产业工人中发展了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大冶工矿区特别支部，为次年元月举行的下陆罢工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5月1日

在武昌阅马场参加庆祝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召开的大会及示威游行。

7月23日

汉阳钢铁厂工人为保护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在罢工受阻的困难时刻，奉命过江了解情况，针对工贼破坏化铁炉罢工的情况，提出“打死工贼韩老三”的口号，使罢工转败为胜。

秋

利群毛巾厂因资金少开销大而倒闭，到武昌模范工厂做工。在利群毛巾厂存在的一年多时间内，为革命提供了资金和活动场所。

九月

发起组织武汉染织工会。

冬

因病回染铺湾休养。

一九二三年（二十六岁）

2月中旬

从共产党员卢春山处听到“二七”惨案的消息，给亲属留下条子，带病赶往武汉，被家里人发现追回。

春末

前往湖南，在长沙望麓园织布厂做技师兼党支部书记。

5月28日

率领长沙人力车工人一千五百余人“反对业主私擅加租”，至警察厅请愿，提出降低车租等六项条件。

6月1日

率领人力车夫参加长沙市民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兵舰水兵制造长沙“六一”惨案。

6月5日

人力车工人经过九天的斗争，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秋

到安源，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作。后任营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安源地委工作。

一九二四年（二十七岁）

5月1日

出席“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大厦落成典礼，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担任总指挥，率领一万四千多名工人群众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

5月9日

冒雨参加“国耻纪念游行大会”。

夏

到上海，准备去苏联学习。

8—9月

乘苏联货轮离沪到海参崴。

10月

坐火车经西伯利亚等地，于月底到达莫斯科。

11月7日

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七周年庆祝游行。

11月中旬

在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运史知识。

一九二五年（二十八岁）

5月1日

在莫斯科红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

5月18日

在东大聆听斯大林的讲话：《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夏秋

奉调回国，在中共上海地委工作。

8月28日

参加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讨论“九七”运动（此年九月七日是辛丑条约签字二十五周年），组织报告、工农报告及妇女组织改组问题，研究训练班问题。决定由张浩负责训练班工作，训练各级党团组织和工会的负责人。

秋

化名林春山在浦东从事工人运动。

12月6日

参加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发起的在青云路召开的“倒段反奉”市民万人大会，声援首都革命。率领群众游行时与包围会场的反动军警发生冲突，头部被军警刺刀刺伤，胸部和左手腕部亦受伤，血流不止。仍发表演说鼓动群众坚持斗争，由于伤势极重，随即昏倒，由

群众抬着冲出军警包围，举行浩大的游行示威。冲出包围后由群众送往宝山路济生医院医治。

由于敌人通缉，不得不提前出院。

一九二六年（二十九岁）

1月

回黄冈县染铺湾养伤。动员爱人涂俊明、三弟林育农、内弟涂延林及堂妹林春芳等参加革命。

2月中旬

率妻、弟、子、妹数人到沪，将弟、妹分别安排在工厂和学校进行革命工作。

2月26日

奉调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杨树浦部委书记。

3月30日

参加中共上海区委扩大会议，讨论主席团报告、工运和外事工作报告。

4月

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

夏

积劳成疾，到上海宝山县城养病。

一九二七年（三十岁）

1月初

奉调到武汉工作，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兼特务队队长，负责维护治安，打击敌特。涂俊明担任侦察员，其公开身份是妇女解放协会工作人员。

2月

涂俊明经王亚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3月

张浩夫妇为了全力以赴地进行革命工作，将刚满三个月的次子林汉南（后于一九四七年在黑龙江林口县剿匪时英勇牺牲）交与大姐抚养。

5月1日

在武汉参加三十万革命群众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18日

夏斗寅叛变，率领工人惩办叛徒。

7月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与王一飞、廖划平、陆沉、李富春等到湖北襄阳，组成鄂北特委，任委员，做冯玉祥部第三师（师长是共产党员张兆丰）的争取工作，未成功。

秋

任汉口市委书记。在法租界公德里十四号（天声街口）利用叔表弟青红帮的关系开设“义兴公”木器店，收集已转移上海的同志的家俱，出租或出售以作为党的经费。在此期间，还先后在长江局和湖北省委工作。

8月中旬——9月上旬

中共湖北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先后派遣了三百六十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秋收起义。张浩被委任为大阳特委委员，参与指挥大冶、阳新、鄂城的秋收暴动。

10月

任武昌市委工委书记。

11月10日

参加湖北省委召开的武汉区、市、县委书记会议，决定罢工、杀工贼、劫狱等工作。会后带领两个工人到徐家棚炸工贼，腕部受伤。

11月27日

参加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建立革命武装和健全组织等问题。

12月14日

参加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贯彻了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左”倾错误，进行了过火的党内斗争，“查办”了省委主要负责人。

一九二八年（三十一岁）

1月

为避免敌人搜捕，搬到福建街附近的一幢二上二下的小楼房居住。楼下是组织部，楼上是军委机关。

1月下旬

根据省委指示，与欧阳梅生、蒋宗文等五人组织中央汉阳县委常会，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龟山脚下欧阳梅生家里。

1月末

为准备年关暴动，组织工人从汉阳兵工厂偷运枪支，被敌人发现。

△在军委工作的宁家庆（跛子）在楼上自造炸弹，不慎爆炸。涂俊明为了背宁家庆转移，失掉了刚满月的小女儿。

2月

搬到汉阳菜市场的棚户区暂住。

同月

到上海。临行时嘱咐为革命殉职的欧阳梅生的妻子陶承说：“最好送孩子进学校去读书”，“将来他们要接替老一辈的事业，总得比老一辈的文化更高些”。勉励陶承要站在高处，看到远景，“看得远才有进取的雄心，眼前一点点挫折，一点点愁苦，就压不倒他”。

4月

临危受命，前往长沙，恢复中共湖南省委。临行时对同志们说：“为了党的缘故，死，我也得去！没有死，党是不会凭空成长的”。

5月1日

在安源与滕代远等组织中共湖南省委。讨论了如何避免敌人的

惨杀和加强与井冈山联系的问题（省委两次派杜修经到井冈山，因敌人封锁未能上山）以及组织湖南幕阜山脉暴动的计划。

△张浩与省委其他成员一道，积极恢复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五月中下旬，萍乡工会正式成立，加入工会人数达七八百人，铁路工作已有头绪，与新河、岳州、徐家棚等站的组织已接上关系。

5月20日

出席中央代表毅希在湘潭召开的省委会议。会议决定完全接受中央对湖南的决议，确定张浩为省委常委、职委书记。

5月21日

与中央代表毅希等回到安源，召集湘东特委会议，通过湘东工作决议案和醴陵暴动决议等。此时得朱德、毛泽东部队到宁冈、遂川、万安一带并缴获杨如轩一部枪械的消息，决定派杜修经再到井冈山。

△化名李春生和张开照，先后隐蔽在安源慈云寺和中窑坡周宅，坚持秘密斗争。

5月下旬

派杜修经将省委给红四军的信送到井冈山。信中分析了国内和省内的形势，要求红四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使红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

6月中旬

杜修经回安源向省委汇报了井冈山的军事斗争形势，边界党的路线和党群工作的基础等问题，但过分渲染了敌人增兵“会剿”井冈山的困难，导致省委作出要红四军从井冈山“杀出一条血路到湘南去”的错误决定。

6月下旬

和贺昌等决定滕代远任湘鄂赣特委书记，到平江巡视并转达省委指示：“驻防平江城国的国民党独立第三师第一团团部有党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是团部的候差副官邓萍，团长彭德怀也是共产党员，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上的红军相配合”。七月二十二日爆发了由彭德怀、滕代

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

7月下旬

井冈山龙源口大捷后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改变分兵湘南的决定，信送到井冈山，红军已分兵去湘南；但对红四军总结八月失败的教训，统一思想认识起了积极作用。

8月16日

湖南军阀何键亲率卫队会同赣军萧希贤团到安源围山搜捕，破坏我党秘密机关十一处，并搜查了中窑坡周宅及慈云寺两处，抓走了周斋婆与和尚张仲华。张浩在群众掩护下脱险。

9月5日

省委秘书李运均被捕叛变，党组织遭到极大摧残，幸存的省委成员无法在湖南立足，分别转移上海。张浩削发为僧，坚持在安源斗争三月余。

10月26日

中共湖南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张浩仍为常委。

年底

因敌人即将第二次搜山，在老和尚的掩护下离开安源。化缘为生，风餐露宿，长途跋涉月余赴上海。

一九二九年（三十二岁）

1月中旬

到达上海，在杨树浦韬朋路“新新如意茶楼”找到林育南接上组织关系。

1月下旬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

4月8日

主持区委会议，讨论沪西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

5月19日

沪西老虎灶工人张学良，因其子小毛被英兵拉入兵营，进行侮

辱，赶往抢救，被英兵毒打致死。张浩发动学生、工人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声讨帝国主义罪行。

5月30日

在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游行示威时，为救护两名女工被捕，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惨遭严刑拷打，头部受伤。约四个月后，由党组织保释出狱，后到杭州治疗。

10月

由杭州返回上海，到全总工作。

11月19日

参加全总党团第一次会议，强调要注意学习，成为职工运动的专家，并起草海员工作决议案。会议决定张浩去海总，以特派员名义兼指导香港工代会。

12月1日

参加全总党团第二次会议，讨论“中央对劳动大会总结的批评与全总今后工作计划”。

12月

起草的《海员工作决议案》被通过。决议案指出，要整顿与健全海总，提出全国海员的共同要求纲领：争取海员群众，保护工人利益，健全船上委员会，揭露反动工会压迫剥削工友的罪恶，强调要在日常斗争中争取领导权。

一九三〇年（三十三岁）

2月14日

在全总工委第二次会议上作“香港与海员问题”的报告，揭露香港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对工人加剧进攻的罪行，指出工人的斗争在酝酿中。

3月1日

参加讨论红色五月工作的问题，提出特别要注意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的同情，还要注意转败为胜的策略。

3月20日

参加全总召开的全国特派员会议，提出：①巡视员、特派员不要包办代替工作；②反倾向问题，要从具体情况出发，要以事实来教育同志。在22日发言中强调在政治罢工时不能忽视工人的迫切要求和目前利益，要坚持群众路线，批评了群众工作中的狭隘倾向，正确指出“委派制度、命令主义、强迫罢工是目前工会运动更要严重注意的问题”。

3月29日

与陈郁向全总工委会议报告海员工作情况。讨论时指出：海员工人要求斗争十分迫切。要反对右倾思想，同时又“不要幻想同盟罢工”。强调要注意中心船的工作，以产业为中心，建立工会组织。全总常委肯定“海员工作最近是比较地有了进步，走到船上去了，加紧了中心船（总统号和皇后号）的工作”。

3月底

任全总驻满洲代表，到哈尔滨指导工作。

4月2日

参加满洲省委会议，组建新省委，任省委常委、工委书记。

4月19日

由于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亭叛变，满洲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三十多名共产党员被捕。省委委员和常委仅剩王永庆和在北满特委检查工作的张浩。

4月27日

组织中东路工人开展反对官办的华工事务所，争取成立工会的斗争，并向中央写了部署这一斗争的报告。

5月1日

组织朝鲜族青年和哈尔滨附近群众举行“五一”集会，捣毁哈尔滨日本领事馆，被警察捕去三十多人。

同日晚

在白俄旅馆开会总结“五一”行动的经验教训时，突被查店的

警察发现，将门反锁，张浩领导大家夺门逃走。

5月7日

根据中央指示，在沈阳与杨一辰等组建满洲临时省委，任临委书记。

5月9日

向中央报告关于哈尔滨“五一”前后的工作和捣毁日本领事馆的经过。

6月

正式成立满洲省委，任省委书记兼职运部长，杨一辰任组织部长，赵毅敏（化名刘昆）任宣传部长，王鹤寿任团省委书记，凌莎任妇委书记。

△为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亲自到沈阳皇姑屯车站和兵工厂以及抚顺煤矿等处指导基层组织开展工作，教育党员和工人增强斗争勇气和信心。到八月，全满洲的党员由三月的二百零六人发展到七百多人，包括团员共有一千九百多人。省委下辖沈阳、哈尔滨两个市委和盘石、吉林、宁安等八个县委，党团支部由三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八十多个。

8月6日

按照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决定，省委改为“总行动委员会”，并任总行委书记。

8月底

陈潭秋到沈阳，改组并扩大总行委，张浩任职委书记兼全满铁总主任。

9月16日

在上海向全总满洲委员会作“关于满洲职工运动概况及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分：一、满洲政治经济状况；二、产业工人数量和其地位；三、工人生活状况与斗争情况；四、工会工作的现状；五、职工会之历史及其缺点。

9月22日

参加全总扩大会，讨论铁路问题。提出：组织群众斗争，一定要提出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明确的斗争目标，指明政治出路，并且要把群众迫切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联系起来，才能发动广大群众。意见受到会议的重视。

9月24日——28日

与陈潭秋参加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揭露了李立三在士兵暴动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罢工的错误。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0月6日——8日

在上海参加全总常委扩大会，会议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职工运动中的错误，并就满洲整个工会工作与全总常委进行了详细讨论。

10月10日

全总发出《给辽宁总工会及哈尔滨总工会信》，信中通知：“仲丹同志即日回满担任全总特派员并转达大会意见”。

10月

与陈潭秋回满，并向满洲省总行委传达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决定撤销总行委，恢复满洲省委。

11月5日

满洲铁总办事处成立，兼任书记。

11月9日

化名陈子真，到抚顺布置工作。十日，在万达屋华工会员刘荣之家中召开抚顺县委扩大会议。会后叛徒范青向日本警察署告密。次日下午三时在返回沈阳途中经深井子车站时被捕，化名张春山。

11月16日——22日

满洲省委举行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在选举新省委成员时，仍当选为省委委员和省委主席团成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被捕后，先被关在抚顺监狱，后转移到沈阳“模范监狱”“信”字号。在审讯中受尽酷刑，几次昏死过去。

△在监狱期间，坚持学习，不断向难友和看守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细心做争取看守和动摇者的工作，说服一度动摇的人推翻了原供，同案三十四人，二十九人无罪释放，五人判刑，张浩被判刑五年。

一九三一年（三十四岁）

春

党组织决定徐克峻到互济会工作，负责营救张浩的工作。

11月

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被捕，关在沈阳“模范监狱”的“梯”字号，张浩闻讯后，及时向他传信，介绍狱中情况，并要他争取转到条件较好的“信”字号里来。

一九三二年（三十五岁）

1月

被营救出狱。

2月

到上海任全总常委兼海总书记。

3月24日

参加全总“关于接受中央路线检查过去错误”的扩大会议，并起草了决议。会议贯彻王明的“左”倾错误，错误地批评了刘少奇的所谓“机会主义”错误。

夏

到上海漕河泾监狱看望被捕的长子林肖碇（化名林吉生），送他一套少年读物丛书，希望他努力学习，坚持斗争。

7月9日

参加全总会议并起草《号召全国赤色工会领导全中国工人阶级

起来援助世界职工运动革命领袖牛兰之决议》。(太平洋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和汪得利曾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者拘捕，后解往南京交国民党反动政府，关在“模范监狱”，至一九三七年九月释放)。

9月

参加全总讨论(纱总)青工代表问题。指出：目前形势“是在恢复状态之下”，“不要一天不断的纪念，要很好的注意到下层搞统一战线、反对派工作等等”。“青工代表会也应该是由下而上的，不应是由上而下的”。“这一工作若不改变即不能化成为群众自己的”。

10月10日

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研究上海丝厂罢工的问题。

10月下旬

参加全总会议，讨论“失业运动问题”。

冬

机关被破坏，安全转移。

一九三三年(三十六岁)

元月

△看望李求实烈士的妻子秦贻君及子李齐泰。

由上海乘海轮经欧洲赴莫斯科参加国际职工代表大会。

2月下旬

到达德国汉堡，由王炳南迎往柏林。

2月28日

2月27日希特勒制造柏林“国会纵火案”。在王炳南陪同下观看正在冒烟的国会大厦现场。

3月

由柏林转赴莫斯科，化名李复生，担任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一九三五年（三十八岁）

6月——7月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参加中共代表团讨论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7月25日——8月20日

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未结束，即启程回国。化名张浩，化装成商人，经蒙古，穿过沙漠，于十一月上旬到达陕北定边。

11月中旬

由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带回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向中央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带回密码，从此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1月20日

出席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发言中指出：目前反对的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地主，如对富农的政策仍是消灭、没收，则影响团结中农、商人、知识分子。

12月6日

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12月8日

和张闻天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回来的毛泽东，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

12月17日——25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年底

中央决定张浩担任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白区军官训练连讲课）。

一九三六年（三十九岁）

1月16日

致电张国焘，说明奉共产国际委派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并带有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新的意见和密码，可与国际通电。

1月17日

中央政治局决定张浩到政治局工作（一说为政治局委员）。

1月24日

致电张国焘，针对张国焘污蔑中央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央红军长征已失败的谬论，旗帜鲜明地指出：“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国际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令其迅速取消伪中央。

2月12日

为准备东征，到黄河边高家村集中水手。

2月

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致电张国焘，指出：“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要接受历史教训，进行检查”。并要求对曾中生、廖承志等“需保全生命”（张国焘早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已将曾中生秘密杀害）。

2月21日

随红军东渡黄河，担任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在山西期间多随总部行动，出席政治局会议。

5月20日

与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指出对外宣传口号是：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

与抗日联军。对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的艰苦奋斗表示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表示欢迎。

5月25日

与张闻天、毛泽东等为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

6月8日

随一军团西征到曲子城做东北军工作。

6月25日

撰写《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批判“左”倾盲动错误与关门主义错误。

7月1日

与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庆祝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介绍西北的政治环境与国内外形势，欢迎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师。

7月下旬

出席政治局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决定为加强西线工作，派张浩到庆阳领导西线统战工作。

夏

在庆阳给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吴华梓（吴化之）写信，希望他到陕北来。

9月初

在环县做东北军的工作，不久从环县回保安。

9月26日

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致电二方面军，请任弼时、贺龙等向张国焘力争北上计划的实现。

10月19日

由保安启程前往宁夏同心城，迎接二、四方面军。

11月3日

抵同心城西南之关桥堡，会见朱德和张国焘。

11月14日

在宁夏同心城豫旺堡红四方面军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

12月初

回到保安，同张国焘谈话，说服他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12月中旬

到定边向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作报告，说明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随后部队南下支援抗日友军。

12月27日

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巩固西北联合战线的措施。

一九三七年（四十岁）

2月

与吴亮平介绍国际友人、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2月27日

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急，遂以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并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任援西军政委。

3月5日

和刘伯承率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兼程西进。

3月中旬

援西军到达镇原、青石嘴一带，因西路军已失败，奉命屯兵镇原，尽力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同时做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郑建民的统战工作，解决部队给养问题。

3月下旬

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期间，与刘伯承一起发出《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意见书》，陈述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

4月初

开始在第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三十一军中系统展开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用无产阶级的高度原则性和党性教育干部战士，

引导大家认清并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讲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提高指战员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通过整训教育了干部，团结了广大四方面军的同志，增强了战斗力。

5月1日

在镇原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6月上旬

援西军因缺粮移驻西峰、长武、泾川一带。

6月17日

与刘伯承、宋任穷分析各阶层的动向，提出我党对策。

7月26日

与朱德、任弼时等致电中央书记处及军委，提出对红军改编的意见。

8月7日

与刘伯承率援西军从甘肃的西峰镇等地出发，经宁县和陕西的旬邑、淳化等地，于八月下旬，到达陕西三原县城以西的石桥镇。

8月20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援西军总部改编为一二九师师部。

8月22日——25日

出席党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了发言。指出统一战线已有很大成绩，但还不巩固，提出要“在抗战过程中实际的争取领导权在我党手里”。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红军的出动应该注意到留下足以保障的力量”。在军事方针上，主张“在侧翼多开展游击运动”，“不一定求开始的硬打求胜，而在最后的胜利。”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军委，张浩为十一名委员之一。

8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张浩为委员。同时，中央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一二九师由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五人组成，以刘伯承为书记。

9月1日

与刘伯承回到一二九师师部。

9月2日

与刘伯承在一二九师师部召开高级干部小型座谈会，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9月3日

与刘伯承召开连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洛川会议精神，宣布改编事宜。

9月4日

正式宣布改编后的干部名单，师长刘伯承、政训处主任张浩（十月一日改为政治委员）。一二九师在特区问题未正式解决前，为保卫边区，暂不开动。

9月6日

冒雨出席在陕北三原县石桥镇召开的全师抗日誓师大会。代表党中央及军委授予一二九师指战员红军十年纪念章。

9月11日

主持师部召开的党政工作会议。内容：1. 审查各团党委名单及师党委候选人名单；2. 讨论改编后部队倾向问题，指出改编后最危险的是右的新军阀主义倾向在开始抬头，强调保持红军十年来光荣的传统，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是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

9月14日

在安吴堡出席师党代会，传达了洛川会议精神。会议进行了师党委选举。

同日下午，出席欢迎出狱同志大会。

9月18日

主持师党委第一次会议，审查各团党委名单，明确师党委分工。

9月26日

在师政治部参加全师巡视工作总结。

△蒋鼎文派乔茂才以高参名义，持蒋介石手令，要一二九师经陇海线转平汉线北上，加入石家庄方面作战，企图割断我三大主力联系，迫使我孤军担任正面阵地防御，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师。张浩协同刘伯承师长决定，由李达参谋长出面交涉，指出：不通过我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是违反按系统指挥军队的惯例的。使蒋的阴谋未能得逞。

9月29日

师政治部召开全师代表会议，布置出师工作。

10月1日

中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命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10月6日

刘伯承师长率师部及七六九团在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为保证全师顺利渡河，张浩亲自做船工的工作。指示陈赓旅长严惩当地贪官污吏。

10月7日

与师直单位和三八六旅一部渡过黄河。

与刘伯承师长向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书面报告全师人马枪支弹药情况。

10月11日

率师直一部及七七二团的两个步兵连乘火车从候马北上。

11月9日

太原失陷以后，师部移驻山西和顺县武家庄，与刘伯承师长不失时机地部署部队转入游击战争。

11月10日

主持师政治部在山西和顺县武家庄召集支书以上的政治干部会议，并作了报告。内容为：1. 目前国际形势与抗战；2. 抗战情形；3. 我们是华北人民抗战的支撑者与山西游击战争的组织者；4. 我们的策略与任务；5. 部队中不良倾向的纠正。

11月13日

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并转刘伯承、张浩等，指出：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

11月14日

主持师部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作了关于支持华北抗战的报告，具体说明了各派遣队的任务。会议决定部队迅速化整为零，实施战略展开，按划分的区域，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1月15日

为适应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与刘伯承师长研究决定举办游击训练班，训练军队和地方干部成为游击“种子”。并经常给训练班讲课，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以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作了组织准备。

△和刘伯承师长与晋冀豫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关问题，决定师的主力部队分别在同蒲路东侧、正太路南侧和平汉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的地区展开。由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等率工作团与步兵分队，分别到沁县、长治、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开展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十一岁）

1月18日

从一二九师调回中央，负责工人运动。

3月初

到陕西泾阳县安吴堡青训班筹建职工大队，招收由沦陷区流亡到西安、宝鸡一带的同蒲路、太原兵工厂、河南巩县兵工厂的工人，以及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的工人。

3月中旬

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成立，任大队长。职工大队的训练目标是：于最短期内，授予工友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教育，培养能在前后方进行各种抗敌救亡工作的工人阶级中的良好干部。并亲自给学生讲课，经常同学员谈心，解决思想问题，提高他们对抗日、对共产党的认识。

4月17日——23日

在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

4月底

为了研究中国近代产业和近代无产阶级的发展及斗争情况，研究抗战以来中国经济所起的变化，亲自到西安民众教育图书馆收集资料。

△对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毕业学员一一谈话后，分配他们到山西、晋察冀、冀鲁豫等地工作，部分人派到大后方做工运和兵运工作。

夏

从安吴堡回到延安，住在党中央所在地——兰家坪，后搬到柳树甸。

7月

在工人干部训练班讲授《职工问题》。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强调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阐明了工会在组织、教育工人和保卫工人利益方面的任务及其在斗争中的作用。

7月14日

为工人干部训练班编印出《职工运动讲授提纲》。《提纲》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特点，总结了职工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阐明了中国职工运动的特点，提出了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根据党中央决定，将安吴堡职工大队部分学员迁往延安，与从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东各地及海外华侨来延的职工一千三百余人，在延安城内府衙门成立抗大职工大队（即抗大二大队）。

8月

作《十年来在职工运动中几个原则问题的检讨》的报告，批评了土地革命时期在工人运动方面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在职工运动中应利用合法形式，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敢于到有群众的反动工会中去工作，对中外资本家与日本资本家实行不同的政策。

9月29日——11月6日

出席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于十月二十八日作了《新的形势新的困难中的职工运动》的发言，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英勇斗争，阐明了持久抗战中职工运动的新任务和不同区域的不同任务与工作方针，强调“工作的方法与方式的是否正确，不在是否合乎某种公式，而在是否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引上逐渐进步的道路”。发言还肯定了党内反张国焘路线斗争是过去党内反倾向斗争的模范，指出“反倾向斗争，不要过火”。

10月初

负责筹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章萍、干戈（杨长春）到抗大职工大队边学习边了解情况。

10月中旬

请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到抗大职工大队作报告，介绍武汉的职工运动。

△向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作持久战中职工运动的报告。

10月底

传达党中央对职工运动工作的指示，中央规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培养干部。

12月初

在柳树甸接待毛泽东同志视察中央职委会机关和抗大职工大队。

一九三九年（四十二岁）

1月

从抗大职工大队挑选审定二百多名勇敢、坚定的年轻工人到中央警卫团工作。

1月22日

撰写“二七”回忆之一：《两个先进的青年》，歌颂林育南、许白昊一九二二年七月领导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斗争的生动事迹。该文后来以《打死工贼韩老三》为题，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四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

2月初

挑选一批年轻工人到抗大军事队学习。

2月7日

撰写《“二七”与抗战》的专论，在《新中华报》上发表。

出席延安职工在抗大三大队礼堂举行的“二七”十六周年纪念会，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及其意义。

2月上旬

领导中央职委会工作人员积极筹办工人学校。

2月中旬

派章萍等同志到西安等地为工人学校招生。

3月初

工人学校在桥儿沟成立，并任校长。

△将抗大二大队六百名学员陆续迁到桥儿沟，编为五个学员队。

3月

领导工人学校成立农工生产委员会，下设缝衣部、鞋工部、木

工部、铁工部、化工部和合作社。到六月份，仅缝衣部一月能做八百套衣服，化工部一月能生产两万多块肥皂、六千袋到八千袋牙粉和供延安各机关、学校用的墨水。

△领导师生员工开荒种地二千五百多亩，植树三千棵。

4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组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康生、张浩、高长久、朱宝庭、乐少华、刘达潮、孔原、李卓然等十人组成。由康生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主持职委会工作。

4月25日

撰写《持久战中工运的新任务》，提出持久抗战中职工运动的八项任务和方针。

5月1日

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主任改称书记，成员不变。下设研究室、编辑室和总务科。

5月1日上午

在工人学校庆祝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发表《我所过的五一》的演说。

5月1日下午三时

参加延安各界在南门公共体育场联合举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

5月1日下午五时

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席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典礼大会。工人学校生产的衣服、鞋袜、毛巾、肥皂、墨水以及木器等产品也陈列在展览会中。

5月4日

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席延安青年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题为《五四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的纪念文章。

5月15日

出席工人学校开学典礼并致开幕词，号召工校学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强调指出：在政治上要向上看，生活上要向下看。“工人不是招牌，而是实际行动的模范”。并宣布“坚定、团结、严肃、活泼”八字为工校校风。

△请刘少奇到工人学校讲《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并主持会议。

6月

请周恩来给工校师生作报告，讲述大后方和前方的形势。

7月上旬

党中央决定在延安的一些学校开赴华北敌后，筹办华北联大。因此工人学校停办，大部分学员与陕公、鲁艺合并成立联大，开赴华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留下的部分学员，根据其特长、经历，分别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和到中央职委会、边区政府工业部、军委第二局等单位工作。

△为执行上述中央决定，向工校师生进行动员，要求大家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永远忠于党和人民，在各方面起模范作用。并在优秀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经过细致审查，恢复了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的党籍。

7月12日

带病到桥儿沟为开赴晋察冀边区的工校学员送行。

7月20日下午

在延安出席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

11月24日

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参加发起人会议。

11月——12月

将留下的工运干部充实到中央职委会机关和建立工会工作团。机关由桥儿沟搬迁到延安城北门外山上，带头建设新环境。

12月

派章萍等为朱宝庭等老同志编写英勇斗争史。

冬

撰写《纪念上海三次起义》，歌颂上海工人阶级惊人的勇敢与牺牲精神，总结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经验。

12月21日晚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斯大林六十寿辰庆祝大会。会议决定筹备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张浩等五十余人发起。

12月25日下午

出席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召开的自然科学讨论会。

一九四〇年（四十三岁）

1月6日

参加自然科学讨论会。

1月15日

与邓发招待到延安参加第二届农工展览会的各工厂工会代表，并举行筹备出版《中国工人》座谈会，定于二月七日出版创刊号。

1月16日

出席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

1月23日

参加第二届农工展览会的边区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举行临时会议，提出出版《中国工人》的三点意见：一、各工厂保证经常投稿，以充实《中国工人》的内容。二、募集基金，作出版的费用。三、征求订户，以扩大读者范围。

1月31日

出席边区各厂工人代表在延安举行的宪政座谈会，报告了宪政运动的意义及方针，成立了由邓发、张浩、朱宝庭等十人组成的延安工人宪政促进会筹备会。

2月1日

出席延安民众讨汪大会，通过讨汪通电。

2月6日晚

主持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纪念“二七”十七周年大会。

2月7日

《中国工人》创刊号出版，发表《“二七”的意义与经验教训》一文。

2月20日

出席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理事。

同日

在《解放》周刊第九十八、九期发表《纪念“二七”的意义》。

3月8日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中国工人》第二期发表《对女工运动的一点意见》。并发表《陕甘宁边区女工的待遇》和《陷入非人生活的日本女工》两篇通讯。

3月24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人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发表《工人与宪政的三个故事》的讲话。

4月10日

出席“工合”延安事务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合作社第一届理事会主席联席会议，发表了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工业生产联合社。

4月13日——21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第二届执委扩大会，并作目前的职工运动的报告。

4月30日

在青年文化沟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在演说时，突发脑溢血，从此一病不起。原计划编写出版《马列主义与职工运动》、《工运参考资料》、《职工运动教程》等《职运丛书》及工运回忆录，因病未能如愿。

同日

在《新中华报》发表《用战斗纪念“五一”的华北工人》，列

举了华北工人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斗争的大量事实，充分肯定了在民族斗争最前线的华北工人的伟大作用。

12月12日

为祝贺朱宝庭六十大寿，在病床上写信，高度赞扬朱宝庭忠实于工人阶级、忠实于民族、忠实于自己的党的高尚品格和“干到底”的革命精神。

一九四一年（四十四岁）

5月

经治疗将半身不遂治愈，但因身体受到敌人多次残酷摧残，使神经、心脏大受损伤，仍不能恢复健康。

6月上旬

在病中写信给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有些同志把皖南事变后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准备同国民党决裂，指出：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他分析了皖南事变不同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原因。主张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6月4日

毛泽东同志在复信中，肯定了张浩的意见，并表示深切关怀：“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

△毛泽东曾亲自到张浩住处看望。

8月4日

因敌机轰炸住处受惊震，入中央医院。心脏扩大三倍，肝脏、脾脏扩大，肺水肿，肾脏亦有病以致全身水肿。

一九四二年（四十五岁）

春

在病中与关向应商量向党中央建议，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受王明路线迫害的同志平反。

3月5日

临终前无限惋惜地说：“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见革命完全胜利”，深以为憾。要求死后葬在党中央驻地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

凌晨一时四十五分逝世。

3月6日下午

遗体移入中央大礼堂，中直机关同志轮流守灵。灵堂外的牌坊上写着“工人先进”“战士楷模”的挽联。

3月8日上午4时至9时

群众吊唁，向张浩遗体告别。毛泽东亲献挽词：“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等亲往吊唁。

3月9日

上午九时，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举行万人公祭，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中央领导号召大家向张浩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敌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学习他对群众的密切联系，学习他在党内正派的作风。祭礼结束，万余人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亲为执绋抬棺，奠土入穴。葬于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

张浩烈士光荣的历史与英勇奋斗的精神，将永存人间。

编 后 记

本书是在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浩同志座谈会之后，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倡议编辑出版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纪念张浩同志的文章和有关的新闻报道等。其中有些是在四十年代延安《解放日报》和五十年代《工人日报》上发表过的；有些是在一九八二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有的是专为本书撰写的新作。这些文章大都在编者进行了必要的加工整理后，送请作者本人审阅定稿。第二部分，作为附录，选载了张浩同志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〇年间有关工人运动的部分文稿。其中包括讲课提纲、发言提纲、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等，共十四篇。这是我国工人运动历史上的一批珍贵文献。它们反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我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因此，这些著作虽然是四十年以前的历史文献，但是它们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搞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全国广大工会干部、职工群众学习和研究。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张浩同志的生平事迹，我们还附录了《张浩年谱》。

本书编辑工作，是在陈用文和唐玉良同志主持下，由本室约请江汉石油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熊经浴同志具体进行的。李海文、林明等同志也参与了部分编辑工作。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革命老前辈和党史学界、档案馆、图书馆，特别是江汉石油学院党委以及张浩同志的亲属等各方面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等条件限制，本书编辑工作定有不少缺点、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